

1786

落实党在农村的 方针政策

农业出版社

落实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

农业出版社

落实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

农业出版社编辑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3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

统一书号 3144·41

1973年7月北京制型

开本 787×1092 毫米

1973年7月初版

三十二分之一

1973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数 73 千字

印数 1—215,000 册

印张 三又十六分之十一

定价 二角八分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农业学大寨

目 录

总结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经验…………… 钟力成(1)

农业和工业互相促进

——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总方针的一点体会

…………… 俞中远(12)

发展工业武装农业 发展农业促进工业

…………… 中共湖南省衡阳地区委员会(21)

努力实现农业机械化……………黎 峰(28)

农业机械要坚持务农

——遵化县发挥现有农业机械作用的调查

…………… 第一机械工业部调查组(35)

* * * *

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

《人民日报》社论……………(39)

具体分析 划清界限

——惠东县石陂大队三个有争论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43)

加强党对山区农业的领导……………中共安徽省歙县委员会(48)

坚持牧区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调查组(53)

坚持储粮 备战备荒

——广西全州县紫岭大队红星生产队的调查报告

…………… 中共全州县委员会调查组(58)

* * * *

提高路线觉悟 认真执行政策

——驳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假共产主义谬论……………江虹(61)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 正确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中共山东省昌潍地委副书记 魏坚毅(66)

落实林业政策 加快山区建设……………(74)

要善于区别政策的界限……中共江苏省泗阳县委书记 刘岳五(77)

用党的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青海省刚察县落实党在牧区经济政策的调查……………(82)

贵在坚持

——铁场大队落实党的经济政策的经验……………(88)

执行政策的带头人……………(92)

* * * *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发挥生产队的积极性……………(95)

他们又参加修塘了……………(98)

* * * *

认真读书 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中共吉林省德惠县委书记 石冶金(100)

坚持政治挂帅 搞好劳动计酬……………临安(102)

划清界限……………(104)

记了工分会降低“风格”吗?……………(106)

从运肥效果看落实政策的作用……………(108)

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兼顾

——马壁大队正确处理基本建设投资和社员

当年分配的矛盾……………(111)

总结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经验

钟 力 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农业连续十年丰收，工业生产持续上升，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基本建设进展较快，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

在工农业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形势下，认真学习毛主席规定的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的光辉思想，总结我们实践这些思想的经验，进一步提高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自觉性，对于继续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看到：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是从属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为它服务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不仅是两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关系，实质上是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阶级的关系。农民同盟军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样，都是极为重要的，正如毛主席所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正确处

理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的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内容。为了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战胜城乡资本主义，巩固工农联盟，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正确处理工农业关系，正确处理工农两个阶级的关系。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看待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问题，进一步提高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自觉性。

二十二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唯物辩证法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斗争。

毛主席早就科学地阐明了农业和工业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关系的途径。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再次明确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以后，毛主席又进一步阐述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并把它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指出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发展。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由于我们贯彻执行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及时排除了刘少奇一伙推行的“重工轻农”、“以重挤农”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农、轻、重关系处理得较好，使我国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农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轻工业、重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迅速发展。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丰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展较快的重要原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毛主席关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相互关系的科学分析，是非常正确的。什么时候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执行这个总方针，农业和工业就迅速发展；什么时候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违反了总方针，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就受到挫折。从全国看是这样，从一个地区来看，也是这样。

有的同志往往孤立地互不联系地看待发展重工业和发展农业、轻工业，只看见三者劳动力、资金、设备和材料等分配上存在矛盾的一面，看不见它们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一面。毛主席早就批判过这种错误思想，指出：“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点必须肯定。重工业是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得到了优先增长，才能够不断用新的技术、新的设备去武装农业，武装轻工业，武装重工业本身，加强国防力量，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迅速地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花很大气力抓好重工业的建设，切实抓好有关的重点企业的工作，及时地总结经验和解决生产发展中

的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同时，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马克思在论及重农主义者时曾说：“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资本论》）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经济。他只能从考察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出这个一般的结论。对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更加明显。要发展工业，矿产资源、设备材料、技术力量等等，当然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但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看问题，最终决定工业发展规模和速度的是农业。农业发展了，才能提供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商品粮、副食品和工业原料，才能扩大工业品的市场，为工业积累更多的资金，促进工业更快地发展。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由于他们的工业发展是建立在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廉价的农副产品、工业原料、劳动力和向这些国家倾销高价工业品的基础上，不仅造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贫穷落后，也使本国农民濒于破产，使农业落后于工业，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畸形发展。正如列宁所说：“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现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遭到破坏、发生危机和物价高涨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与此相反，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国有最广阔的国内市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来自工、农业内部积累，农副产品依靠本国农业提供，工业产品的销售依靠国内市场。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按照农、轻、重关系的客观规律，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和工业。

在我们国家，轻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也是互为条件互相促

进的。轻工业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关系极为密切，发展社会主义轻工业，就会以日益增多的轻工业品支援农业，同时又可以使更多的农副产品成为轻工业的原料被利用起来，增加农民的收入，进一步促进农业的发展。多办轻工业，就可以使重工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原料和生活日用品；同时，轻工业的发展又需要重工业部门提供大量原料和新的机器设备，这又可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先有农业的多，才有轻工业的多；先有农业、轻工业的多，才有重工业的多；重工业的多又转化为农业、轻工业的更多。这是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发展的辩证法。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就可以使它们互相转化，相互促进，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全面地发展。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从一时一事孤立地看，用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的劳动力、资金、设备、材料多一些，用在发展重工业方面的就少一些，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似乎就要慢一些。其实并不是这样。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农业、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就能更好更快地发展，结果速度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如果不懂得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的辩证法，以为从农业、轻工业挤点劳动力、资金、设备和材料，重工业可以发展快一些，结果就会和主观愿望相反，农业、轻工业的少将会转化为重工业的少，农业、轻工业的慢，将会转化为重工业的慢。所以，这里存在一个对于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还是不厉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想得厉害，就要重视发展农业、轻工业，加速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这样，就会使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地迅速地发展。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是不是因此就不必花气力抓农业了呢？决不是。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水平总的来说还是不高的。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平衡，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没有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我国还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农业生产的潜力很大。我国工业在不断发展，农村提供的商品粮和各种工业原料还不能满足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要更多更快地发展工业，最重要的仍然是要继续大力发展农业。抓好农业，尽快地把我国农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进一步发挥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这是处理好农、轻、重关系的关键，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事**。

发展农业，最根本的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靠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寨精神，靠六亿农民。我们要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继续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还要继续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工业要为农业服务，要大力支援农业。

工业部门要用更多更好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支援农业，以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步伐。这是发挥工业主导作用的重要方面，是我国工人阶级支援贫下中农进一步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巩固工农联盟的光荣任务。努力实现农业机械化，是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重大措施。毛主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实现农业机械化，才能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改变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就可以腾出更多的劳动力搞深耕细作、多种

经营和其他经济建设,就可以为工业提供更多的粮食、原料和劳动力,工业的发展就会更快。工业拿更多更好的机械、化肥、农药等支援农业,这些工业品就会转化为更多的粮食、副食品、工业原料和劳动力,反过来支援工业。因此,工业部门的同志要把支援农业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来做好,要切实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为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更大的力量。认为农业机械化与自己“关系不大”的思想是错误的。农业机械化是细致复杂的工作,涉及到钢铁、机械、燃料、化工、电力等许多工业部门,涉及到科研、生产、配套、维修等各个方面,工业部门只有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做好这项工作。要特别注意生产当前农业急需的农机、配件、化肥、农药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各级农机修造网。地方工业要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大力支援农业。计划用于农业的资金和钢材等物资要切实予以保证,不得挪用,不能减少。

工业要支援农业,农业也要支援工业。从农业看,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继续认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内部各业之间和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安排好农、林、牧、副、渔和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这样两个布局。这是一个关系到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着三个主要比例:农业内部的比例,工业内部的比例,以及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农业两个布局的安排情况,不仅影响农业本身的发展,而且对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也有直接影响。当前我国轻工业原料大约百分之七十来自农业,粮、棉、油、麻、丝等,都是极为重要的工业原料。林、牧、副、渔等项,有的是

直接的工业原料，有的是工业发展不可缺少的。有了农业的全面发展，才可能有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全面发展。在以粮为纲、抓紧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既可以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又可以增加集体经济的积累和社员收入，为工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促进农业和工业更快地发展。因此，各级领导部门，农村人民公社要从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全局出发，来对待农业生产的两个布局问题，认真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把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处理好。工业以及其他各个部门，在支援农业时，也要从农业全面发展的需要出发，在提供工业品、制订合理的收购价格，以及运输、收购等方面，积极为促进农业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都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一个合理安排劳动力的问题。工业与农业各占用多少劳动力，存在着一定的客观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是由农业发展的水平决定的。马克思说：“能够投于工商业上面而无须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数——或如斯杜亚所说，‘自由的手’的数目——是取决于农业者在他们自身的消费额以上，能够生产多少的农产物。”（《剩余价值学说史》）我国当前农业机械化程度还不高，农业生产大部分要靠手工操作，劳动力是最主要的生产力。因此，必须十分注意合理分配劳动力，首先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这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工业顺利发展的保证。如果工业劳动力和城市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农业发展水平所许可的限度，过多地从农业抽调劳动力，就会影响农业生产，增加农业的负担，这对农业的发展和工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所以，对于劳动力的分配，一定要根据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先考虑农业

发展的需要，再考虑工业发展的需要。这是分配劳动力的一个基本原则。整个国民经济的劳动力分配要根据这个原则，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安排也要根据这个原则。

合理分配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劳动力，不仅是对农业的支援，也是对工业部门进一步挖掘生产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力促进。发展工业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一种是增加劳动力，扩大基本建设的规模。增加劳动力仅仅是发展工业的一种方法。不断提高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路线觉悟和业务技术水平，充分挖掘现有设备和人力的潜力，研究、应用和推广新的科学技术，改善劳动组织和企业管理等等，比起单纯增加劳动力来，对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是更加有效、更加实际、也是更加重要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增加或少增加投资，不增加农业的负担，就能够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工业品，不仅能支援农业更快地发展，也能为工业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是一种多快好省的办法。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政治挂帅，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广泛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力求在不增加或少增加劳动力的情况下，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使一个人发挥两个人以至几个人的作用，使一个厂发挥两个厂以至几个厂的作用。

从长远看，要扩大再生产，不进行基本建设是不行的。但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于人力、物力、财力总有一定的限度，基本建设的规模不能太大，不能超过农业生产发展所许可的水平。同时，必须按照统一的计划，分清轻重缓急，先后主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但是，有的同志一

谈到工业基本建设，总想把摊子铺得大一点，技术搞得洋一点，项目搞得全一点、多一点，每每分散兵力。要看到，如果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规模过大，分散了人力、物力、财力，不仅会拖长基建项目建成投产的时间，影响投资效果和重点项目的建设；还可能挤占发展农业的劳动力、资金、设备和材料，影响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影响工业的发展，其结果是想快反而慢，想大反而小。长与短，多与少，是相对的，辩证的。全和多，总是由不全、不多发展而来的。先有不全然后才有全，先有不多然后才有多。根据客观需要与可能安排基建项目，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建一个、成一个、投产一个，看起来好象少一点、慢一点，实际上是会更多一些、更快一些。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是三个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农、轻、重的比例，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比例。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经常注意按照“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完全有可能按照客观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提倡顾全大局”，从全局出发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安排农、轻、重的关系是领导机关和计划部门的事，同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关系不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固然，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安排好农、轻、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全局是由局部组成的，局部会影响全局。每一个地区的农业、轻工业搞得好不好，重工业的发展是否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不仅会影响局部，也会影响全局。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又说：“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

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打仗是这样，经济建设也是这样。每个地区、每个单位都应当努力学会掌握农、轻、重关系的客观规律，并把自己的计划和工作，放在安排好农、轻、重关系这个全局中来考虑，在进行每一项经济活动，安排每一个基建项目的时候，在分配劳动力、资金、设备和材料的时候，都要考虑到全局，服从全局。这样就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地迅速地向前发展。

十五年前，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要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以路线为纲，继续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二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六期）

农业和工业互相促进

——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总方针的一点体会

俞 中 远

如何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在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必须真正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抓住农业就有了主动权；必须围绕农业的需要来发展地方工业，同时搞好工业内部的平衡，使工业更好地为农业服务。这样，才能使农业和工业互相促进，同时并举。

我们对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解与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是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比较，经过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解放前，河南省十年九灾，农业很落后，粮食亩产只有几十斤，更谈不上有什么工业。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各项正确政策的指引下，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农业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因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一些地方一度曾经出现过因盲目地发展工业而忽视农业的现象，结果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都受到影响。错误路线从反面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深刻了一些，抓农业的自觉性就提高了一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排除了来自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认真抓了路线教育和政策落实，逐步改

变农业生产条件，加快了农业发展的步伐。我省由长期调进粮食，初步做到了粮食自给有余。农业的连年丰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主动权。轻工业由于农业提供了较多的原料，自给率比文化大革命前提高一倍；在农业和轻工业的支援下，一批中、小型工矿企业发展起来，生产不断上升；全省市场繁荣，物价稳定，购销两旺，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日益增多，革命和生产的形势很好。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工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粮食和其他副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也是办工业的基本条件。农业上不去，粮食不充裕，许多问题就不好解决。办工业也离不开农业为它提供原料、劳动力和销售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为工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工业才能办好；农业上不去，工业和其他事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即使勉强办起来，也不会持久。这是一条客观规律。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豫东地区是个有名的老灾区，风沙、盐碱、旱涝长期为害，农业上不去，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也很缓慢，常常陷于被动局面。近几年来，由于加强了对农业的领导，从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入手，大打农业翻身仗，一九七一年粮食已经自给，林、牧、副等业也有较大的发展。随着农业状况的好转，整个工作开始有了主动权，地方“五小”工业也跟着发展起来。相反，有个别县由于受到农业发展水平的限制，想办工业也办不起来。农业面貌改变不大，工业也就发展不快。从时间上来看也是这样，那一年的农业丰收了，那一年工业的日子就好过，就发展；那一年的农业歉收，那一年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影响。

从河南省当前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看，农业的发展适应不了工业发展的需要，是一个突出的矛盾。近几年来全省

农业虽然又有了一些发展,但总的说来,当前农业生产的水平还相当低,底子还很薄,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农业为工业所能提供的商品粮、副食品和工业原料还很有限,而工业对于这些的需要却是逐年增加的。从河南这些年的情况看,要使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二十,一般地说是比较容易抓得上去的;而要使农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二十,要比工业困难得多,费力得多。所以,只有抓住农业,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才能使这个矛盾解决得好一点,使农业的发展与工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促使工业发展得更快一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应当要快于农业;但是工业任何时候也不能脱离农业这个基础。并举,不是平均使用力量,在一个时候总要有一个侧重点。我们要花力气抓农业,也要花力气抓工业,但是目前要花更多的力气抓农业,这样才能换来更多的工业。所以,应该自觉地扎扎实实地抓好农业,使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牢靠。这也是形势逼人。如果不这样做,农业就会拖工业的后腿,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就会遇到困难。

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我们努力把经济工作的重心,牢牢地放在农业上。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抓农业;并选派大批有经验的老干部充实各级领导机构,切实加强对农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对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注意解决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农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同时,组织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切实地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这也是巩固农业这个基础、加强农村阵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力、物力、财力的安排上,要体现以农、轻、重为序的思想,把发展农业放到首要地位。为了从各方面加强农业,计划用于农业的资金、钢材和设备等,我们采

取措施予以保证，不挪用，并争取逐年有所增加，如近几年每年用于农业和直接支援农业的钢材，约占全省钢材总数的三分之一，直接或间接用于农业的投资，占全省地方基本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在分配劳动力的时候，首先考虑农业发展的需要。事实证明，对农业是抓还是不抓，抓得紧还是不紧，效果大不一样。认真地抓，农业的发展就快，形势就好；凡是没有这样做的地方，农业的发展就慢，其他事业的发展也就差一些。

要进一步发展农业，必须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农业实现机械化，这是农业对工业提出的一个很迫切的要求。农业合作化以后，河南的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靠手工劳动，生产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年景好，粮食产量增加快一点；一旦遇到较大灾害，粮食产量就不稳定，其重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低和抗灾能力差。这说明，没有工业的支援，农业的彻底翻身是有困难的。只有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才能进一步改变农业的面貌，使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一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从工农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抓住影响农业生产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组织整个地方工业的力量，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在河南，危害农业生产最大的是旱涝灾害，影响农业产量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肥料不足。因此，我们就集中地方工业的主要力量支援农业解决水利和肥料的问题。河南平原地区解决旱的问题的主要办法是靠打机井灌溉。打机井需要打井机械和建筑材料，机井配套需要机、泵、管、带。几年来，我们组织机械工业等工业部门为农业提供了二十多万套机井配套设备，使全省水浇地的面积扩大

一倍多。机井配套、动力排灌增强了农业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解放初期用轱辘浇地，一眼井只能保浇几亩，后来改为解放牌水车，能保浇十几亩，现在换成动力排灌机械，能保浇六十亩到一百亩。解决肥料的问题，发展养猪事业需要饲料粉碎机，生产化肥需要化肥设备。我们为农村生产了十多万台饲料粉碎机、六十多套年产三千吨合成氨的小化肥设备，使每亩地的施肥量逐年增加。过去，夏收夏种劳力紧张，小麦打场要用十几天的时间，有的地区因小麦不能及时脱粒，经常发生霉烂现象，致使丰产不能丰收。一九七二年，我们向农村提供了六万七千多部小麦脱粒机，用机器脱粒，一个生产队一般只用两、三天的时间就够了。农业有了机器，有了化肥、农药，就能腾出更多的劳力搞农田基本建设，搞精耕细作，发展多种经营，就能增加生产。工业支援农业，钢铁变成了粮食。一九七一年同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六。

工业支援农业，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工业本身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拿出更多的粮食、副食品和原料支援工业，而且为重工业开辟了广阔的市场。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指出：“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这几年，我们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有了比较深切的体会。随着集体经济公共积累的逐步增多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村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和购买力都提高比较快。农业对工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对工业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工业推

动了农业，农业又推动了工业。

支农工业的发展，在工业内部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解决动力排灌问题，需要钢铁、电力、水泥等，引起了冶金工业、电力工业、机械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的发展。生产化肥，需要煤炭、化工原料，引起了煤炭、化学工业等的发展。就是这样，全省的电力工业、钢铁工业、煤炭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等地方工业发展起来了。一九七一年全省的工业总产值，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事实证明，遵循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就能使农业和工业在互相矛盾的运动中互相促进。粮食变成钢铁，钢铁又变成粮食；农业的增产转化为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又转化为农业的增产。

围绕着支援农业来发展地方工业，需要经常注意一个问题，即要使地方工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同农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办多少工业，那些可办，那些不办，那些先办，那些缓办，一定要根据农业所能负担的能力而定。否则，不仅不能支援农业，反而可能削弱农业这个基础。全省是这样，一个地区、一个县、一个公社，都是这样。工业的发展如果不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工业的发展也不稳固。工业挤了农业，常常是一时看不出毛病来的，可是等到发现问题再来解决就比较费力了。有的同志，想多办、快办点工业来支援农业，但由于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贪大求全，这个也要“上马”，那个也要“大办”，结果非但不能支援农业，反而可能影响当前的农业生产。所以，发展地方工业不仅要有为农业服务的动机，而且还要收到促进农业发展的实际效果。

工业和农业的适应与不适应，突出地表现在能不能合理地安排劳动力的问题上。农业与工业，当年的农业生产与长远

的农田基本建设各占用多少劳动力，要根据农业当前的发展水平来决定。从实践中我们体会到，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这是关系到农业发展，也是影响工业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在安排劳动力的时候，要本着先农业后工业的原则，工业需要的劳动力也要保证，但必须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安排，严格控制。这样做了，农业、工业就得到发展；违反了这个原则，农业、工业的发展就会受到挫折。

工业要更好地支援农业，还必须处理好工业内部的关系。发展地方工业如同发展整个工业一样，要从原材料搞起，不能搞“无米之炊”。尤其重要的是要发展钢铁和煤炭。有了钢铁和煤炭，其他事情就比较好了。因此，地方工业必须贯彻以钢为纲的方针。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花一点力气搞好小钢铁和小煤矿的建设，是必要的。有了钢铁，发展“五小”工业就会比较主动一些。发展小钢铁、小煤炭等“五小”工业，要因地制宜，由小到大，土洋并举。有条件的多办，条件差的少办，无条件的不办，不要勉强去办自己不能办到的事。例如化肥工业，有些县，煤的资源丰富，交通方便，就多办些；有的县，既没有煤，又无其他原料，就先不办。这不仅避免了浪费，而且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地方工业要支援好农业，也必须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加强综合平衡，正确地发挥地方积极性。毛主席教导说：“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真正把各地的积极性正确地组织起来，大家动手，想办法，出主意，克服前进中的困难，事情就好办了。但是，发挥地方积极性，一定要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顾全大局。现代工业的一个特点是各个部门、各种产品的生产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大部分产品需要在全国、全省分工协作，有的需要在一个地区分工协作。只有统

筹兼顾,适当安排,才能作到经济合理,避免浪费。省和中央,有一个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地、市、县和省也有一个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每个局部在考虑和安排自己的工业发展计划时,都要从全局出发,“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我们在发展地方工业中,要把这一点提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强调先中央、后地方,先重点、后一般。事实证明,这样做,地方“五小”工业就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如果一个地区、县不顾条件,贪大求全,想万事不求人,其结果就可能产生盲目发展,造成浪费。

“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在发挥地方积极性,建设地方工业的过程中,局部和全局,需要和可能,经常发生矛盾,这是正常现象。这要根据党的路线和政策,用综合平衡的办法,不断调整,不断解决矛盾。近几年来,我们针对有的地区不能正确处理长远建设和当前建设的关系,以及工业的发展方向、企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及时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有计划地进行调整和整顿。突出了重点工程的建设,缓建了某些工程。已经建起来的“五小”工业,方向对头、条件好的继续发展,加强领导,个别方向不对头,原料、燃料、动力没有保证的就不勉强办,或者转产。这样做,是积极的,不是后退,而是更好的前进。经过整顿,“五小”工业的产品方向明确了,质量提高了,在支农战线上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引着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地向前发展。我们对于这个总方针的认

识还是初步的，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实践中，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处理好工农业关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十期）

发展工业武装农业 发展农业促进工业

中共湖南省衡阳地区委员会

在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指引下，近几年来，我们衡阳地区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注意正确处理发展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工业、武装农业的辩证关系，使工业和农业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一九七一年，在遭受严重干旱的情况下，全区粮食总产量仍然比大丰收的一九七〇年增产一成，稻谷平均亩产八百一十斤；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多种经营收入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四点四，比一九七〇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八。农业的迅速发展，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全区办起来的小钢铁、小化肥、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有色金属厂矿以及为城乡人民生活的轻、化工厂矿，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五百四十个发展到现在的一千七百八十三个，增加了二点三倍，逐步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

正确认识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的关系

衡阳地区过去工业基础薄弱。有一段时期，大家想多办一些工业，尽快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但是，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的关系，在刘少奇“重工轻农”、“以工挤农”等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加上缺乏经验，一

度过多地抽调了农业劳动力，挤了部分农业投资，影响了农业的发展。结果，发展工业缺乏粮食、原料和资金，工业生产的打稻机、化肥等产品销售不出去。一些地方厂矿只得下马。

超过农业的发展水平去办工业，工业肯定上不去。但是，农业发展了，不发展地方工业行不行呢？也不行。我们地区的不少县、社，由于改变耕作制度，增加复种指数，粮食产量有了一定的提高。可是，没有相应地发展地方工业，用工业支援农业，结果，造成劳力不足，肥料不足，农药不足，水利排灌也跟不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农业和工业，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脱离农业抓工业，不仅工业上不去，还会扯农业的“后腿”；同样，片面地抓农业，不去相应地发展地方工业，用新的技术、新的设备武装农业，农业前进的步子同样会受到限制。

近几年来，我们注意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既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发展工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又积极发展地方小型工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由于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地方工业也相应发展起来。一九七一年，全区地方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了四点一倍。由于地方工业的发展，反过来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并增加了化肥和农药生产，进一步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一九七一年，全区机电排灌面积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一点四倍；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也有较大增长。一九七一年全区已有三个县、二百四十九个公社粮食亩产上了《纲要》。

经验证明，如果脱离农业这个基础，不顾农业生产发展的现状，动不动就抽调农业的劳力、资金和材料去办工业，这样势必加重农业的负担，动摇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形“左”实右的路线。反之，当农业迫切需要工业支援的时候，如果看

不到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不去积极创造条件办工业，坐等国家支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正确的做法，只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把农业的需要作为发展地方工业的方向

如何发展地方工业呢？我们始终坚持把农业的需要作为发展地方工业的方向。在具体做法上，我们注意了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正确处理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发展钢铁、化肥、农业机械等工业，投资多，利润少，甚至在短期内还会亏本。如何正确对待它，是能不能按照农业需要办工业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遇到两种倾向：一种是只顾目前利益，看不到实现农业机械化、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利益，怕赔钱，不愿办。另一种是只看长远利益，不顾目前利益，认为工业支援农业作用大，亏点本划得来，不积极解决亏损的问题。我们批判了这两种错误倾向，坚持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了一批钢铁、化肥、水泥、农业机械等企业，以使用更多的工业产品武装农业；另一方面，狠抓路线教育，加强经济核算，开展技术革新，实行综合利用，积极解决目前铁厂、化肥工厂等企业的亏损问题。采取了这些措施后，祁阳县铁厂日产生铁由六吨上升到九吨，焦比显著下降。衡南县氮肥厂日产量由十五吨多上升到四十吨以上，超过了日产三十吨的设计水平，成本相应降低。

实践证明，这样做既促进了工业的巩固和发展，又加强了

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目前,全区钢铁、化肥等企业发展情况良好,支援农业越来越有力。一九七一年,全区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钢材达一千五百多吨,水泥三万三千吨,化肥九万五千吨,比一九七〇年都有大幅度增加。

二、正确处理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与发展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大工业服务的工业的关系。我们强调地方工业要为农业服务以后,有的同志又产生了忽视发展轻工、有色金属等工业的倾向。我们就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教导,并组织大家学习祁阳和衡东两县积极发展轻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积累了资金,促进了重工业发展的经验。

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国民经济各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工业,从产品上看,好象不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但是,它们在为农业经济作物开辟市场和积累资金方面(如轻工业),或在发展直接为农业服务的重工业方面(如有色金属工业),却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想多办一些直接为农业服务的重工业,就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轻工和有色金属等工业。以后,大家坚持正确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一九七一年与一九六五年比,全区轻工业产值增长了四点九倍,有色金属工业生产量增长了七倍,钢铁、水泥、化肥、机械、煤炭等重工业的产值增长了一点一倍。

三、正确处理发展地、县工业和发展社、队工业的关系。有一个时期,我们有的同志只注意抓地、县工业,不那么支持社、队办工业的积极性,怕社、队“抓了工业,丢了农业”,结果,生产队打稻机坏了一个螺丝都要到县城去修,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后来,有的同志又只注意发动群众办社、队工业,提出“四面开花”,忽视地、县重点工业的建设。针对这些问题,我们

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指示，总结了经验教训，既批判了那种不相信社、队办工业的积极性、束缚社队工业发展的保守观点，又批判了那种“四面开花”、失去重点的盲目作法。一方面，积极支持社、队办工业；另一方面，有计划有重点地安排好地、县重点厂矿的建设。

“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在地、县厂矿的帮助下，社、队办工业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一九七一年全区社办的小铁矿、小煤矿、小化肥厂、小机械厂、小电站比一九七〇年增加了一点六倍。这些小厂矿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挖掘各方面潜力，适应各地特点，就近为农业服务，方便贫下中农，充分显示了调动各级办工业积极性的好处。

注意加强统一领导 搞好综合平衡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树立全局观念，统筹兼顾，抓好工业和农业的平衡，这是地方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以后，必须注意的问题。

一、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搞好工业布局。在规划地方工业建设时，我们注意调查研究，认真考虑县、区、社的不同条件。有些县农业发展得比较快，粮食有余，原料充足，就多办些工业；反之，就少办一些。有些县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地区就在这里多办一些工厂；有的县已有一些中央、省办工业，地区就不办或少办工厂。这样，既有利于工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支援农业。如祁东县近几年农业生产发展快，粮食亩产连续两年跨《纲要》，铁矿资源也较丰富，就由地、县两级在这里办起了两个规模不同的铁厂，现在一直发展得很好。祁阳县有种甘蔗的传统，甘蔗生产发展快，一九七一年种植面积比一九

七〇年增加四倍。我们便在这个县建设了一个年产八百吨的糖厂，既就近利用了本地的甘蔗，又利用糖厂的蔗渣做猪饲料支援农业，促进生猪的发展。这个厂当年施工，当年投产，当年就有了赢利。事实证明，凡是适合各地农业生产发展水平，根据就地取材原则办起来的地方工厂，发展都比较好，既不愁原料，又不愁销路；反之，就发展不了，即使建设起来，也不能充分发挥在支援农业中的作用。

二、合理安排，不与农业争劳力。如何妥善安排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比例，是直接关系到工农业生产全面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能够投于工商业上面而无须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数……是取决于农业者在他们自身的消费额以上，能够生产多少的农产物。”从我们地区目前情况看，农业机耕面积还不到百分之九，主要农活基本上还靠手工操作。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的这种基本状况，就决定了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不能随便减少，投入工业的劳动力不能随便增加。否则，就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在劳动力的安排上，我们采取以下几条办法：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人力。地区一九七一年扩建了一些厂矿，原计划从农村招收几百人。后来，采取开展技术革新、减少非生产人员、改善经营管理等措施，全部由工业系统内部调剂解决了。二是尽量利用城镇街道居民办工业。全区十七个小集镇，据不完全统计，已组织一万九千多人，办起了六百二十九个小工厂，产品达一百多种。兴办这种小厂，既没有占用农业劳力，又充分发挥了城镇居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三是实行亦工亦农，以农为主，农忙务农，农闲做工，并严格控制数量和分布情况，尽量从田少人多的地方招收。由于保证了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稳定的劳动力，粮食生产就上得比较快，多种经营也开展起来了，

为发展轻工业和重工业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

三、服从统一计划，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有一年，大家办地方工业积极性很高，都想多搞、大搞基本建设。有的地方在国家基建计划项目以外，又安排了不少自筹资金建设项目。这就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挤了农业的劳力、材料、资金和土地，既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又分散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妨碍了重点基本建设项目的完成。结果是想快反而慢，想大反而小。鉴于这个教训，近两年来我们在工业基本建设中，十分注意反对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与可能，分别轻重缓急，统一规划。坚持从小的、土的、容易办的、见效快的办起，由小到大，由土到洋，不贪大求洋；坚持局部服从全局，缩短战线，保证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贪多求全。做到建设一个，投产一个，巩固一个。一九七〇年以来，全区重点新建的六个铁厂、八个小高炉，都是依靠群众，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当年施工，当年投产的。实行统一规划、保证重点的结果，地方工业的发展速度不是慢了，而是快了。

我们的体会是，只有不断解决新的矛盾，不断搞好综合平衡，才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原载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努力实现农业机械化

黎 峰

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鼓舞下，一个农业机械化的群众运动正在不断发展。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实现农业机械化，归根到底，是个路线问题。在要不要机械化和怎样实现机械化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为更快地实现农业机械化扫清道路。

有些同志存在着忽视农业机械化的错误思想，认为“实现了集体化，可以不搞机械化”，还认为“迟化早化，关系不大”。这种思想显然是同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相违背的。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们国内的基本矛盾。从这个基本矛盾出发，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了我们党在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这就是：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

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毛主席在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深刻指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在人民公社化以后，毛主席又及时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毛主席的指示，揭示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规律，阐明了农业集体化与农业机械化的辩证关系。农业集体化，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是农业机械化的必要前提，只有先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使农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为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农业机械化，是在技术方面由手工生产到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是农业集体化的必然趋势，只有实现农业机械化，才能使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和发展。因此，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农业机械化。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农业生产连续十年丰收，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加巩固；农业生产越发展，对农业机械化的要求越迫切，实现农业机械化已成为广大贫下中农的强烈愿望。而那些认为“可以不搞机械化”和“迟化早化，关系不大”的同志，却没有听到亿万农民迫切要求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呼声，更没有认识到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意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必须看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实现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的发展，就可以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农业机械化，用机器去装备农业，就可

以不断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生产出更多的粮、棉、油等重要物资，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生活必需品，使工农联盟建立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因此，实现农业机械化，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的重要措施，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农业机械化发展比较缓慢。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五年超过了十年。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就迅速发展；否则，就要受到挫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用搞农业集体化的劲头，努力实现农业机械化。那种“迟化早化，关系不大”和“可以不搞机械化”的说法，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实际上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有这种思想的人，在波澜壮阔的农业机械化高潮面前无所作为，停步不前，习惯于按常规办事，如果不纠正，必然会落后于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

在怎样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不是积极地、认真地去发动群众创造条件，而是坐等依赖，说什么：“农业机械化好是好，只有等到条件具备才能搞”。这也是一种妨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错误思想。

不错，要实现农业机械化，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是不行的。但是，关键在于怎样去看待条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设备、工具和原材料等物质条件，对于实现农业

机械化,是重要的因素,但是,它们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们干革命,搞建设,要依靠群众,搞群众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搞农业机械化,我们同样要发扬这种精神,依靠广大群众自己动手,去创造条件,战胜困难。在这方面,大寨的革命群众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说:“不怕没条件,只怕志气短”。论条件,大寨大队只有山头、石头、榔头和锄头。但是,大寨党支部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紧紧地依靠广大贫下中农,依靠集体力量,自己积累资金,自力更生办农业机械化,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基本上实现了农副业生产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湖北的新洲,河北的遵化,山西的晋城,四川的什邡,江西的泰和,广西的陆川和吉林的榆树等县,由于坚持了自力更生的方针,都大大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力量来源于群众,自力更生的威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只要广大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有革命的干劲和办法,就能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那些认为“只有等到条件具备才能搞”的同志,老是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认为这也办不到,那也办不到。他们往往在困难面前无所作为,只靠别人,不靠自己,只会伸手,不愿动手,其结果是手越伸越长,志越来越短,“土”的不愿干,“洋”的又干不了,延误农业机械化的进程。这种懦夫懒汉思想,是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背道而驰的。

“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的教导。我们批判那种坐等物质条件、看不见

群众力量的错误思想，决不是否定工具、设备和原材料等物质条件对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作用，而是为了正确地处理人和物的关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更快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条件。实践证明，光坐等依赖，自己不下苦功夫，不花大力量，物质条件是不会自然产生出来的；只有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充分发动群众，把正确的认识变为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力量，才能为农业机械化创造出条件。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进一步贯彻工业“以钢为纲”的方针，搞好以钢铁等原材料工业为主的地方“五小”工业，把农业机械化建立在“有米之炊”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配套，使农业机械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湖南省攸县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的教导，根据资源条件，因地制宜，先后建成了七个小铁矿，三个小铁厂，一个小钢厂和一百多座小煤窑，自己开矿，自己炼铁，自己轧钢。使这个县很快就建起了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生产了大批农业机械和化肥、农药等产品，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副业生产的发展。

要实现农业机械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也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可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工业和农业对立起来，竭力反对工业支援农业，破坏农业机械化事业。有些同志认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只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与自己无关，说什么：“我管我的齿轮弹簧，你管你的五谷杂粮。”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

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深刻地反映了农业和工业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实现农业机械化，就能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发展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提供更多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积累更多的资金，开辟更广阔的市场。离开农业这个基础，工业的发展就会成为“空中楼阁”。然而农业的发展，又必须靠工业的支援，没有强大的工业，就不可能独立自主地迅速发展农业。为了迅速地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工业部门必须大力支援农业，全心全意地为农业服务。要提高农业机械化的水平，并使现有的农业机械更好地发挥作用，就要求工业部门生产出质量好、效率高的各种耕作、排灌、收获、加工、运输、植物保护等机械和农机配件，以及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产品。在工业支援农业的同时，还必须注意，不要随便抽调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需要。

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各行各业必须树立全局观念，认真做好支援农业的工作。如果只从局部考虑问题，就会认为支农与自己关系不大，是额外负担。农业机械化牵涉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需要各行各业的支援。除了工业的支援外，还要求商业供销部门，开辟货源，及时供应支农产品；要求交通运输部门，迅速地、不误农时地把支农产品送到农村。江苏宜兴县农机供销门市部，“店开在城里，心想着农村”，他们既管供，又管修，还管技术培训，远处设分销点，近处送货上门，日夜供应，不误农时，支援了农业，也扩大了自己的经营范围。山东莱阳动力机械厂，把支农看成是分内的事，既搞制造，又搞修理；既生产主机，又生产配件，而且还把零配件邮寄到贫下中农手里。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影响本厂的生产，相反，很快地增加了品种，提高了技术水平，降

低了成本。事实证明，工农业是互相促进的，工业和其他行业大力支援农业，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且也促进各个行业本身的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就号召我们：“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是艰巨的，时间是紧迫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团结起来，抓紧今后不到十年的时间，为完成在我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三期）

农业机械要坚持务农

——遵化县发挥现有农业机械作用的调查

第一机械工业部调查组

河北省遵化县通过抓方向，抓配套，抓维修，充分发挥现有农业机械的作用，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

抓方向，纠正农机不务农倾向

要发挥现有农业机械的作用，首先要解决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还是跑运输赚钱这个方向问题。一九七〇年冬天，这个县的建明公社搞农田基本建设，急需拖拉机运石拉土，推河垒坝，改土造田。这时，用拖拉机给厂矿企业运货，一天可赚二百多元。有的人认为“只吃家门草，铁牛养不好”，主张放下农活，用拖拉机去跑运输赚钱。建明公社的领导同志针对这种倾向，组织干部、社员和农机站机务人员学习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教导，批判“重运输、轻农田”的错误思想。大家认识到，国家造了拖拉机给农村，主要是让发展农业生产用的；农业机械是不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这是个路线问题，决不能“外面赚了钱，社里扔了田”。于是，他们就立足于本社的山、水、田，实行人、机、畜结合，常峪山下造平原，沙河滩上造良田。近几年来，共建成大寨田三千余亩，平整土地五千亩，改良土壤四千亩，改河造田和闸沟造田一千五百亩，推河筑坝三十八里，使

沿河两岸五千多亩土地解除了洪水的威胁。一九七一年在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全社平均亩产粮食达五百六十斤。一九七二年在抗旱过程中，这个公社又用拖拉机推大口井十九眼，水坑三十个，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获得了好收成。

县革委会及时总结并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了建明公社的经验，纠正了有些社队农机不务农的错误倾向，发挥了农机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

抓配套，扩大农机作业项目

要发挥现有农业机械的作用，扩大农机作业项目，就必须狠抓农机具配套。只有拖拉机、柴油机等主机，没有相应的配套农机具，“有头无尾”，主机再多也不能发挥作用。

这个县一九七一年购买的四十八台中大型拖拉机，配带的配套农具只有五台犁和三辆拖车；新买的六十一台小型拖拉机，只配有旋耕机。为了解决配套农具不足的问题，他们统筹安排，合理分工，自力更生动手造。县农机修造厂主要制造大中型拖拉机的配套农机具；社、队修造站（点），主要是在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的基础上，制造一些小型的配套农机具。西留村公社修造站坚持修旧利废，实行土洋结合，把废旧的马拉双轮双铧犁改为悬挂式两铧犁，用小石碾做镇压器，为手扶拖拉机搞了十八台配套农机具。过去，社员们看到手扶拖拉机缺乏配套农具，作业项目少，不愿意要。现在，由于狠抓了配套，手扶拖拉机能进行十一项农田作业，社员们非常满意。

在制造配套农机具的过程中，遵化县特别注意因地制宜。他们根据本县三山两川、沙河如网的自然特点，从农田基本建设和精耕细作、科学种田的要求出发，搞了梯田机、平地机、铲

运机、开沟犁、平畦筑埂器，以及适用于间作套种的带田播种机等十四种二百八十五台(组)，改革半机械化农具七十五种三千二百台。现在，这个县拖拉机的作业项目，已由过去的耕、耙、压“老三样”，扩大到平地、改土、治河、造田、播种、起垅、打井等十八项，使拖拉机由“半年闲”变为“全年忙”。

抓维修，提高农机完好率

要发挥现有农业机械的作用，还要做好保养和维修工作，使农业机械经常保持完好的技术状态，延长机器的寿命。如果只造不修，一坏就丢，就会大大影响农业机械化的速度。

这个县抓农机维修，首先注意发挥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的作用，坚持修造结合，以修为主，基本上做到了小修不出队，中修不出社，大修不出县，省工省钱，方便群众，支援了农业生产。一年多来，这个县修理拖拉机、柴油机、脱粒机等农机具六千七百五十台，修理半机械化农具和小农具十万多台(件)。此外，还制造了维修和配套急需的农机配件三十种三万一千七百多件。县修造厂和公社修配站经常派出修理小组，深入社队，边修理，边传授技术。营房公社和官场公社修配站，用小毛驴拉着工具和零配件，串村上门修理，广大社员赞扬说：“社办站真是行，支援农业方向明，修配省工又省钱，贫下中农最欢迎。”

为了提高农机完好率，这个县还坚持贯彻“防重于治，养重于修”的原则。过去，有的拖拉机因维修保养不好，在农忙的关键时刻不能使用。现在，从拖拉机全年作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原来的冬修制度改为计划预检修制度，以防坏了才修。小辛庄公社有一台用了十四年的链轨式拖拉机，由于精心使

用和保养，常年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延长了大修间距，全年完成的作业量折合一万零八百标准亩，每亩平均耗油零点七五公斤，每亩成本为四角二分。遵化县抓住这个典型，组织全县机务人员参观学习，推动了全县农机的维护保养工作。目前，这个县有百分之七十的拖拉机做到了“四净”（油净、水净、气净、机具净）、“三不漏”（不漏油、不漏水、不漏气）、“五良好”（调整、紧固、润滑、电气、仪表良好）。

为了加强对农机保养维修工作的管理，县农机局和公社农机站，设有机务组和机务负责人，专门负责农机的使用保养、安全教育、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等工作。同时，建立和健全了农机管理、使用和维修等方面的十项规章制度。由于抓了经常的保养维修，农机完好率不断提高：去年为百分之八十一，今年上半年又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一。

（原载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

《人民日报》社论

毛主席提出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生产方针，反映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农业生产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多年来，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支援世界革命人民，都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革命在前进，生产在发展。全国人民的需要，整个国民经济和农业生产本身的进一步高涨，都要求农业战线在继续增产粮食的同时进一步开展多种经营，进一步实行全面发展。

能不能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营，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的指导思想如何。必须把这个重大的方针，提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必须狠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斗争，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干扰和破坏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罪行。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就指明了，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个重要

方面，是相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只要坚定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办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依靠广大群众，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扩大多种经营。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过去狠抓粮食生产是正确的，今后也必须把粮食生产抓紧，决不可稍微放松。没有粮食生产的发展，就说不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说不上多种经营的发展。对于进一步发展粮食生产，必须继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同时，也必须注意，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决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相促进的。既要增产粮食，又要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在劳动力、土地、资金等方面确有一定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也只有很好地安排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才更有利于使全劳力、半劳力、辅助劳力和有各种专长的社员各尽其能，而且在各个季节都有活可干。发展多种经营，可以为集体经济积累更多资金，加快农业机械化，这就又可以腾出更多劳力全面发展农业生产。至于土地，在多种经营的条件下，比单一经营更便于合理安排、充分利用。荒山、水面、河滩、“四旁”等等，单一生产粮食不便利用的，实行多种经营就都能排上用场。肥料不足，从发展牧业、林业、油料、养蚕等等方面，正好可以开辟更多的肥源。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地力、物力的潜力是可以一挖再挖的。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综合利用，正是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一条广阔的道路。这样做，才符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有的同志划不清正当的多种经营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种经营，忽视抓多种经营。对此，应当加强路线和政策教育，予以澄清。有资本主义的多种经营，有社会主义

的多种经营，决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决定于执行什么路线，决定于指导思想是什么。如果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只顾赚钱，不顾国家计划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那样搞多种经营当然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那是必须批判、必须制止的。但是，决不可把党的方针、政策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正是为了进一步壮大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战胜资本主义势力，才更要下气力领导群众搞好多种经营。这个重要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我们不去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营，那就等于在这个阵地上给资本主义让路，那才是错误的事情。

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应该允许和指导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从事适当的家庭副业。“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要教育社员先公后私，反对弃农经商。

以粮为纲，是就全局而言。就各个不同地区来说，要注意因地制宜。一般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把粮食生产抓紧抓好，同时根据当地条件，积极发展其他经济作物和牧业、林业、渔业、副业生产。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牧区、林区、渔区，应分别以经营牧业、林业、渔业为主。这些地区，当然也要在可能条件下积极地生产粮食和其他作物，也不要搞单一经营；但是，应当集中主要力量完成主要任务。对于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或留粮标准，要保证每人平均口粮不低于附近粮食产区的一般水平。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并不是不看实际情况，不分主次缓急，一涌而上。多种经营的项目很多，必须根据各地的条件和国家的计划，适应集体经济和社员群众的需要，统筹安排。要

从实际出发,避免主观主义。

国营经济应当尽力促进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工业部门要提供多种经营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商业部门要加强多种经营的产品的收购工作,正确执行党的价格政策和奖售政策。同时,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全面规划,落实党的政策,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我们的社会主义农业一定能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轨道上更快更好地前进。

(原载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具体分析 划清界限

——惠东县石陂大队三个有争论的问题
是怎样解决的？

广东省惠东县白花公社石陂大队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的教导，针对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中出现的问题，从路线上进行具体分析，按照政策具体解决，推动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进一步落实。

鱼塘要不要扩大？

三年前，石陂大队邓屋生产队几个青年建议，利用一个山冲，筑堤蓄水，扩大原来位于这个山冲的鱼塘，以便多蓄水，多养鱼，多灌田。这个建议一提出，就出现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说：“这样搞，山冲里的两亩多水田就会淹掉，以粮换鱼，是和‘以粮为纲’唱对台戏！”一种说：“扩大水塘好处多，既有利于发展粮食生产，又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完全符合‘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两种意见争论了几年。

一九七一年冬天，在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罪行时，扩大鱼塘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党支部领导成员深入到这个生产队，同大家一起学习党在农村中的有关政策，并从基本路线的高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大家看到，鱼塘扩大后，虽然原有的水田减少了两亩多，但是，筑堤后，整个山冲

变成一个大水塘，蓄水量可以增加几十倍。只要建一个提水站，就可以把位于鱼塘上面的几十亩旱地改为水田；再搞一个二级提水站，周围一百多亩坡地也都可以得到灌溉。扩大了水塘，还可以多养鱼。这确是既有利于发展粮食生产，又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

为什么有的同志会把这件事看成是违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呢？大家继续分析，认识到这些同志一是看问题有片面性，只看到原有水田减少的一面，看不到蓄水多了，更多的旱田可以改水田，扩大水田的一面。二是受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反革命的需要出发，把多种经营和粮食生产对立起来，只强调单一的粮食生产，表面上似乎是重视粮食生产，实质上是要砍掉多种经营，阻挠“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贯彻执行，妄图达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

经过具体分析，原来主张扩大鱼塘的民兵和群众说：“开始我们也只看到这样做有利于生产和增加收入，那里会想得这么深？这一讨论，把我们的认识提到‘纲’上‘线’上来了。”原来不同意扩大鱼塘的人说：“过去我们看问题片面，只看事情的现象，看不到事情的实质，这一讨论，把我们的路线觉悟提高了。”

统一认识以后，大家鼓足干劲，奋战三十天，扩大了鱼塘，增加了养鱼量，建立了提水站。一九七二年早造扩大了十一亩水田，经济作物也第一次实现了引水灌溉。

瓦窑要不要下马？

在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过程中，上油塘生产

队办了一个瓦窑。由于路线教育抓得不紧，方向不明，集中劳动力太多，在大忙季节同农业争劳力；对瓦窑人员的报酬，又实行了错误的包工办法。这引起了一些社员的非议。由此，有人认为陈屋生产队的瓦窑也有问题，说这个队的花生种晚了是受了办瓦窑的影响。这两件事反映到党支部后，支委也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两个瓦窑都有问题，都要下马。另一种意见认为，处理这件事不能“一刀切”，简单化。

党支部经过调查，发现陈屋生产队的瓦窑和上油塘生产队的瓦窑，情况大不一样。陈屋生产队的瓦窑，贯彻了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的原则，大忙停窑，农闲开窑，而且瓦窑只占五个劳力，同农业生产矛盾不大；花生晚种几天，是劳力安排问题，不是办瓦窑问题。在经营管理上，他们正确处理了农业劳动和副业劳动报酬的合理差别。由于经营方向对头，这个瓦窑为生产队积累了资金，用来购买了一批化肥和抽水机、柴油机、碾米机、磨粉机等农业机械，解放了劳动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党支部把调查结果摆出来，原来说两个瓦窑都要下马的，不再坚持了；原来认为搞副业危险的，认为搞多种经营会影响粮食生产的，也改变了看法。事情就是这样奇怪，相当长时间难于统一的想法，现在就象找到了开门钥匙一样，一下就把心窍打开了。这个钥匙，就是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型事例。

接着，大家从路线上分析，指出：方向对头不对头，不在于搞不搞工副业，而在于办工副业时执行什么路线。在正确路线指引下的工副业和多种经营，不但不影响粮食生产，而且有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发展社、队工副业，是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一项

重要任务。上油塘生产队的干部开始听到别人批评时，误认为“抓副业危险”，现在，他们却深有体会地说：“不是搞工副业危险，而是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危险。”他们学习陈屋生产队办窑的经验，自觉地对瓦窑进行整顿，把瓦窑办好了。

家庭编织能不能搞？

正当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的时候，横峰生产队有个社员看见大队改变了过去不允许搞家庭编织的规定，就埋头在家编织竹箩、竹篮等竹器，自留竹用完了，又到外地去采购，竹器本地销不完，又运到外地去销，集体生产却不放在心上。后来，有的社员也学他的样，生产队的出勤率降低了，集体生产受到影响。对于这一现象，干部群众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个队有竹源，历来有家庭编织竹器的习惯，现在这样做，属于正当的家庭副业，问题不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塘坝窟窿越漏越大，家庭副业这个口子开不得，还是禁止私人编织竹器为好。

党支部主要领导成员发现这一情况后，来到这个生产队，找干部和老贫农反复座谈商量，从路线上进行具体分析。

他们首先分析横峰生产队目前这样搞家庭编织，是有问题，还是问题不大？大家摆出：现在家庭编织过多，竹子要从外地购进，竹器要运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地方去卖，这是社员在业余时间难于胜任的。这样做的结果，集体出勤率降低了，生产的进度比邻队慢了，劳动质量差了。这样下去，集体生产必将受到严重损失。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四大自由”、“金钱挂帅”的影响下，曾经出现过这种现象。那时，一些人顾私不顾公，一心搞家庭编织，结果生产队的编织场垮了

台，粮食减产，社员收入减少。

但是，能不能禁止家庭编织呢？通过分析，认识到，第一，本队有竹源，又有编织竹器的习惯和技术，不搞家庭编织，不利于物尽其用，人尽其能；第二，编织出来的竹箩、粪箕、筛子等都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禁止家庭编织这些东西，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利；第三，队里的老人小孩等不能参加大田劳动，不搞家庭编织不利于发挥他们的作用；第四，搞适量的家庭编织，社员可以增加收入。过去，在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这里曾经搞过所谓“拔修根”、“割尾巴”的错误做法，收回了社员的零星果树、竹木，不准社员搞家庭编织。结果，不仅家庭副业大大减少，而且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集体的多种经营急剧下降，粮食生产也上不去。

对处理家庭编织竹器的问题，过去有过深刻的教训，为什么现在又会重复这些错误倾向呢？通过反复分析，大家指出，根本的问题是基本路线在头脑里扎根不深，遇到具体问题，就忘记了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对待社员家庭编织，要么不闻不问，要么一律禁止，走两个极端。这两种做法，都违反党的政策，都会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这样一分析，对大家的教育很深。原来把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做法看作是正当副业的人说：“头脑里没有基本路线，看问题自然会偏，会迷失方向。”原来说要取消家庭编织的干部和社员说：“过去认为这样搞是革命，谁知上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当，从另一个方面干扰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我们一定要在三大革命斗争中，不断提高路线觉悟。”认识统一后，生产队迅速恢复了集体竹器编织组，并鼓励社员在业余时间适量编织竹器。

（原载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加强党对山区农业的领导

中共安徽省歙县委员会

抓紧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

我县地处皖南山区，盛产粮食、茶叶、竹木和其他经济作物。如何发展山区农业生产？我们的体会，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前，我县山区建设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农业合作化运动促进了山区生产的发展。与解放初期相比，一九五七年粮食增长近一倍，山场有林面积扩大了三倍，茶园扩大了一点二倍，茶叶产量增长了一点八倍。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左”的方面，否认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性质，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破坏山区生产。后来，他们又从右的方面兜售“包产到户”等黑货，使集体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下，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山区生产又发展起来。一九六五年，粮食产量比一九六一年增加四成多，毛竹蓄积量增长了两倍多，茶叶产量增长了两倍，林木蓄积量逐年上升。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和复杂的。革命的高潮总是带来生产的高潮和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只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就能

使山区建设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蓬勃发展。

正确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

我县自然条件复杂，既有大山区，又有半山区。根据各地的条件，我们体会到，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一定要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在粮食产地，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同时在可能条件下积极发展林茶生产和其他副业。在大山区，则以发展林茶为主，同时也要在可能条件下积极地生产粮食和其他作物。具体到每个大队、生产队，要根据实际情况，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茶则茶，但也要注意发展其他作物，做到粮林茶各业全面发展。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反映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展山区生产，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过去我们对这个方针理解不全面，不顾山区山多田少的情况，笼统地要求以粮食生产为主，片面强调粮食“上山”，结果，不但粮食生产没有发展，还使林茶生产受到影响。事实上，在山区以林茶为主，绿化荒山，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是有利于粮食生产的。而且，山区一般都位于产粮区的上游，山区发展林茶生产，搞好水土保持，既有利于当地粮食稳产高产，也有利于下游的产粮区的生产。竹铺公社岭脚大队过去对山、水、田的关系处理不当，造成山坡无林，水土流失。这个大队的上坑坞，有十三亩水田因为缺水改成旱地，后来又被一场山洪冲垮。干部和群众总结了教训，对全大队一万多亩山地全面规划，积极植树造林，综合治理山、水、田。近几年来，不仅林茶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粮食也持续增产。

山区以林茶为主，并不是说不要努力增产粮食。在抓好林茶生产的同时，也要尽可能抓好粮食生产，提高粮食自给水平。这里，主要是认真落实农业“八字宪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可以利用缓坡、荒滩、洼地，改田造田，扩大耕地面积，力争多生产些粮食。此外，我县广大群众历来就有林粮间种的经验，总结和推广这些经验，也有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

落实政策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山区生产项目繁多，政策性强。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弄清了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同现阶段党的政策的关系。我们体会到，只有认真落实现阶段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才能保证山区建设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因此，我们把党的经济政策，作为路线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了宣传和落实。主要抓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落实山林所有权。山林所有权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问题。我们通过抓点、调查，一个一个地落实了山林所有权。近两年来，全县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制订了“护林公约”，选派了护林员，山林的经营管理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改善，林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

二、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我们着重抓了林、副各业劳动的合理计酬。根据技术高低、劳动强度，对从事林、副业生产的社员按同等或略高于同等农业劳动人员记工。

三、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划清了正当家庭副业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和破坏资源的前提下，社员经营家庭副业，是符合党的政

策的，应当给予鼓励和指导，既不要乱加干涉，也不要放任自流。

四、正确执行价格政策和奖售政策。山区生产商品性强，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正确执行价格政策。国家收购茶叶、蚕茧等经济作物和木竹、畜产品，实行合理的奖售制度，也有利于这些生产的发展。

五、搞好山区缺粮队的口粮供应。在以林茶为主的山区，群众口粮标准应不低于附近的产粮区。实践证明，这样做也是有利于林茶生产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的。

改进领导作风 扎扎实实建设山区

搞好山区建设，要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我县六联大队，山高地陡，条件很差。经过干部和社员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建成石砌梯地六百多亩，土埂梯地五百多亩，茶林粮得到很大发展。一九七一年，收干茶十三万多斤，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一倍多，产粮四十多万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县委同志经常到这个大队，学习群众不怕苦、改造山区的革命精神，并教育全县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推动了山区建设的发展。两年多来，全县改田造田五万多亩，新开茶园二万七千多亩，植树造林三十万多亩。

搞好山区建设，必须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过去，我们在工作上往往满足于一般号召，常常产生主观性、片面性。近几年来，我们坚持调查研究，努力减少工作上的盲目性。我县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山坞田，过去都是种单季，产量很低。一九七〇年，我们到春联大队下坞生产队调查，发现这里在山坞田里种双季稻，获得亩产超千斤的好收成。我们总结

推广了这个大队的经验。一九七一年，全县双季稻面积比一九七〇年扩大了一倍，一九七二年早稻面积又比上年增加了三万多亩。

搞好山区建设，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做到长短结合，不能“重短轻长”，也不能“抓长弃短”。在农田基本建设中，首先发动群众大搞投资小、花工少、收效快的项目，同时有计划地搞一些投资大、花工多、建设时间较长的重点工程，力求做到多快好省。在林业生产中，我们一手抓生产期长的松杉用材林的发展，一手抓生产期较短的油桐、油茶、果木、毛竹和茶叶的发展，以经济林促用材林。在南乡一带贫困山区，我们大抓养猪，发展药材、麻类、茶叶等当年或短期有收入的多种经营，增加当年收入，增加集体积累，提高社员生活，支持长期建设，逐步改变这类地区的贫困面貌。

（原载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坚持牧区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调查组

内蒙古镶黄旗新党委成立以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执行自治区党委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的“以牧为主,农林牧结合,因地制宜,全面发展”的牧区生产方针,争取畜牧业在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优质、高产。

他们在执行牧区生产建设方针的过程中,不断遇到各种思想障碍。一种思想把以牧为主和单一牧业经济混同起来,认为以牧为主就会走单一牧业经济的老路;另一种思想把掌握牧区牧业生产规律和牧区特殊论混同起来,认为在牧区应该大量开荒种地,争取粮食自给,不然就是牧区特殊论的黑货。“靠天养畜”的落后的游牧经济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也还没有肃清。贫下中牧对旗里的领导干部在执行牧区生产方针上的摇摆,提出了尖锐批评:“忽而光抓牲畜数量,忽而大搞种地开荒,到底什么是牧区生产的方向?”

广大牧民的反映,引起了旗委的重视。他们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八个公社和二十几个大队,调查了畜牧业生产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产生思想阻力的原因。为了统一思想,明确方向,旗委发动群众,上下结合,联系牧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认真总结了在执行路线、方针上正反两个方面的

经验教训，进一步分清了两条路线和两种方针的界限，分清了社会主义牧业和资本主义牧业的界限。

划清牧业特殊性和牧区特殊论的界限

执行以牧为主的方针，是不是就意味着搞牧区特殊论？旗委和各级干部一起，按照毛主席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教导，分析了这个问题。牧区的畜牧业，有它本身特殊的矛盾，它同其他各业有区别，同农区的牧业也有区别。掌握牧区的畜牧业生产的特殊规律，才能保证牧区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承认牧区畜牧业生产的特殊性，决不等于赞同牧区特殊论。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牧区特殊论，实质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认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不适用于牧区。离开党的基本路线，离开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去讲特殊，就要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他们用白音塔拉公社汗乌拉大队的实例，认真解剖了牧区特殊论的反动实质。这个大队受牧区特殊论的影响，不抓阶级斗争，阶级阵线不清，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泛滥，牲畜年年下降。经过“一打三反”运动，落实党的阶级政策，坚持以牧为主的方针，近两年牲畜年年增加，面貌一新。

批判了牧区特殊论以后，一些人又否定牧区畜牧业生产的特殊性，全旗一度出现了牧场滥垦、滥用，对牲畜乱杀、乱卖的妖风。这股妖风所到之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抬头，个别大队牲畜下降三分之二，公共积累分光。很清楚，阶级敌人搞的这一手，同样是为了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

专政。

通过反复讨论和批判，他们明确认识到：必须结合牧区实际情况深入地进行思想和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才能彻底破除牧区特殊论的影响，纠正忽视牧区牧业生产特殊性的倾向，巩固牧区社会主义阵地，稳定地发展社会主义牧业生产。

划清以牧为主和单一牧业经济的界限

过去，牧区一些地方在牧区特殊论的影响下，实行过单一牧业经济的错误方针。批判了这种错误方针以后，有人又片面地认为，牧区要学大寨就要搞粮食上“纲要”。有的牧业队大量开荒，削弱了牧区的主业，破坏了草场，畜牧业受了损失，粮食收成也很低。

单一牧业经济的不稳定性，并不是每个人都认清了。有一个时期，黑沙图大队的干部不重视牧区的基本建设，不注意因地制宜地发展为牧业服务的农业、林业，“单打一”地抓牲畜。一九七〇年牲畜虽然增加百分之十四点五，但草源无保证，防寒设施少，牲畜膘情不好，遭到一场风雪，牲畜头数就又降了下来。

为了彻底纠正忽视以牧为主和只抓单一牧业经济这两种错误倾向，他们到各社、队召开了一百多次座谈会，同广大群众和干部一起，敞开思想，认真讨论，划清以牧为主和单一牧业经济的界限。

大家认识到：提倡单一牧业经济，就会把广大牧民永远束缚在“靠天养畜”的游牧生活的圈子里，不利于社会主义畜牧业发展。一些牧民说：“过去我们十年九走场（因受灾而到很远的外地借场放牧），人畜两遭殃，一遇灾害，资本主义倾向

就抬头。这就是单一牧业经济的恶果。”

他们还从路线上对忽视以牧为主的倾向作了分析。反对牧区以牧为主，不建设甚至破坏牧业所必需的草原，实质上是一条毁灭社会主义畜牧业的道路，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

他们结合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教导，进一步认识到：在牧区执行以牧为主，农林牧结合，因地制宜，全面发展，这个方针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和牧民的利益。

全旗有四十个大队，坚持以牧为主，积极种树、种草、种料，大抓基本草牧场和棚圈建设，一九七〇年虽然遇到较大灾害，仍然夺得了牲畜纯增百分之二至六的好收成。昆都伦大队坚持以牧为主、农林牧结合，年年造林，林间育草，因地制宜种植了饲料四百六十亩，补充了天然草场的不足，初步做到了饲草饲料自给，在连续两年遇灾的情况下，一九七一年牲畜纯增百分之九，一九七二年仔畜又比一九七一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一。旗党委认真总结和推广了这个典型经验，进一步摆正了牧业和农业、林业的位置，推动了牧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发展。

镶黄旗由于坚持了以牧为主，农林牧结合，因地制宜，全面发展的方针，认真解决了牧业生产中的一些具体矛盾，充分调动了各族牧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畜牧业和牧区建设有了新的的发展。除了天然草场，优良牧草种植面积由一九七一年的二百亩扩大到两万亩；建立饲料基地约一万亩；成片造林一万六千七百多亩；两年修建棚圈三千四百座，每个畜群组都有了畜棚；全旗各社、队还建立了畜病防治网。在连续两

年畜牧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一九七二年上半年，战胜了严重的风、雪、旱、冻等自然灾害，牲畜比上年同时期纯增百分之十二点六，改良畜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多了一点五倍。一九七一年为国家提供的细羊毛相当于一九六三年的四倍；支援农业的耕畜、役畜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了两倍。集体经济日益巩固，牧民生活不断提高。

（原载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坚持储粮 备战备荒

——广西全州县紫岭大队红星生产队的调查报告

中共全州县委员会调查组

全州县才湾公社紫岭大队红星生产队，从一九六八年以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生产迅速发展，粮食连年增产。这个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在逐年增加出售给国家的商品粮，适当提高社员口粮的同时，认真做好集体与社员储备粮食的工作。到一九七一年底，集体储备粮食达十九万多斤，社员储粮二万三千多斤。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手中有粮心不慌，备战备荒有保障。”

红星生产队的干部从实践中体会到，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提高群众的路线觉悟，是搞好储粮的关键。每年秋收后，这个队的干部都要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艰苦奋斗和一定要有储备粮的指示，根据生产发展情况，讨论、制订集体储粮计划，坚决执行。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时候，生产队干部，把教育社员为革命搞好集体和个人储粮的工作，当作落实战备和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大事来抓，使大家认识到，搞好储粮工作，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就可以为赢得胜利打好物质基础；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就能以丰补歉，战胜灾荒；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就能使群众更加信赖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更加巩固。同时，干部还请老贫农讲“三史”，引导社员忆旧社会糠拌野菜填肚子之苦，思解放后政治上翻身，生活迅速改善之甜。广大贫下中农说：“过幸福日子不能忘记过去的苦，形势大好不能忘记储粮备战备荒”。大家自觉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逐步增加粮食储备。一九六八年，集体储粮两万多斤，一九六九年增至八万多斤，一九七〇年再增至十四万斤，一九七一年达到十九万多斤。四年来，社员储备粮食逐步形成习惯，有储备粮的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八十三点四。

这个生产队在储粮备战备荒的过程中，坚持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不断排除干扰，保证了储粮工作的顺利进行。一九七〇年，生产队和社员的储粮增多了，阶级敌人恨得要死，在暗地进行破坏。一个富农份子胡说“集体多储备，上调光打光，干部争光荣，社员要上当”，煽动群众分掉集体储备粮。针对这种情况，生产队发动群众分析在粮食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三光四不留”的修正主义黑货，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贫下中农愤怒地说：“阶级敌人破坏储粮，妄想挖社会主义墙脚，复辟资本主义，要我们走回头路，我们定不上当。”少数曾经提出“储粮由民，分粮自由，卖粮由己”错误主张的社员，从路线上分清了是非，说：“把集体储备粮分了，上集市卖高价，这条资本主义邪路，万万走不得，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储备，保卫储备粮。”这一年，原来的储备粮不但没有分掉，还新储备了五万多斤。

严格集体储备粮的管理制度，对于巩固储粮成果关系极大。在这一方面，红星生产队认真做好了以下几项工作：

坚持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制度。生产队每年向社

员进行两次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教育。检查计划用粮情况，表扬勤俭节约的社员，对浪费粮食的现象提出批评，在全队逐步树立节约用粮、计划用粮的新风尚。生产队队长五口人吃饭，精打细算，计划用粮，几年来储备粮食八百斤。有个贫农社员，坚持勤俭持家，每年都储二至三个月的余粮。由于计划用粮的活动深入开展，从一九六九年开始，没有一户社员向生产队借粮，集体储备粮也没有动用，真正做到了无战、无荒不动用。

坚持实行民主管理集体储备粮的制度。这个队建立了有干部、贫下中农、民兵参加的三结合的管粮小组，负责管理集体储备粮，定期检查储粮情况，公布帐目，经常听取群众意见，改进管理工作，从而堵塞了各种漏洞，杜绝了贪污浪费。社员们说：“民主管理集体储备粮，我们很放心。”

坚持实行粮情检查制度。生产队自力更生修建了容量六十万斤符合国家要求的粮仓，并挑选思想好、责任心强的贫下中农担任粮食保管员。在当地粮食部门的帮助下，他们认真学习粮食保管业务，及时检查粮温，测报粮情，及时防止了虫蛀、鼠耗、雀食和霉烂变质。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十一期)

提高路线觉悟 认真执行政策

——驳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假共产主义谬论

江 虹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代表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党领导广大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解放后在农村工作中，他们既从右的方面，极力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从“左”的方面，散布形“左”实右的超越历史阶段的假共产主义谬论，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目前，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谬论，对我们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很有必要。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论者。革命是不断发展的，又是分阶段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些不同的革命阶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必要准备，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既不能在某一个革命阶段停

步不前，也不能不顾客观条件，超越历史发展阶段。

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我们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继续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解放后，我国农村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就是我们党自觉地运用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规律，引导农民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今后，人民公社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转变，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也将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过程。在生产力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现有的所有制形式还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一切机会主义者都是反对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把事物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否认不断革命的必要性，“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旧阶段。……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否认事物的界限，否认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不同的革命阶段有不同的政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既推动了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又体现了革命发展的阶段性。毛主席为我党在各个革命阶段提出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还教导我们不要超越阶段，要“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分清界限”。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并没有超

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毛主席及时地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政策。在现阶段，党在农村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政策，以及在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政策，都是毛主席根据现阶段我国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制定出来的。我们只有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断巩固集体经济。

但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钻进党内的一些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总是采用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来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以达到他们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罪恶目的。刘少奇一类骗子在他们大肆推行的“包产到户”等右倾机会主义政策遭到批判以后，就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提出“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实际上是要砍掉社会主义政策。他们给人以假象，好象只要实行他们那一套黑货，就可以“提早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刘少奇一类骗子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就叫嚷要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他们鼓吹这种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谬论，就是妄图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和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理论是完全对立的。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给他们的机会主义黑货贴上革命的标签，还自称“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并把他们形“左”实右的谬论说成是“彻底革命”的理论。真是恬不知耻！

不同革命发展阶段的转变，不是听凭人们想早就早、想迟就迟，而必须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现阶段，我们党制定的农村各项政策，是完全适合当前我国农村的实际情

况和群众要求的。正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人民公社才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如果按照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那一套去做，那就势必瓦解集体经济，使党脱离农民群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工农联盟。这就根本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

刘少奇一类骗子还歪曲共产主义的原则，胡说什么只要“有饭吃，有衣穿”，“人人过得去”，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他们别有用心地把“按需分配”的原则曲解为“拉平分配”。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显然，这里所说的实行“按需分配”的条件，只有在“三大差别”已经消失，产品极大丰富，人民觉悟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具备。但现阶段，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离这一目标还很远。刘少奇一类骗子贩卖他们那一套形“左”实右的货色，竭力鼓吹绝对平均主义，否定“按劳分配”，其罪恶目的就在于使一部分人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破坏群众之间的团结，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刘少奇一类骗子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归根结底就是阴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胡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还说什么：“是不是要等群众的觉悟提高到那种程度，等各方面的条件全部成熟后再宣布实现共产主义呢？当然不

是”。刘少奇一伙的这些澜言是地地道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货。他们否定群众觉悟程度这个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就是反对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按照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这个反动“理论”，不搞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使我们在阶级敌人的进攻面前解除武装，资本主义势力大为猖獗，社会主义阵地日益缩小，其结果必然导致反革命复辟。

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断地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原载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 正确执行 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中共山东省昌潍地委副书记 魏坚毅

我参加革命后一直在本地工作。过去，我总认为自己情况熟，又有些实际工作经验，干好工作没问题。可是往往事与愿违，主观上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而在实际工作中却有时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基本原因是自己理论水平不高，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理解不深。自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我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学习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等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改造思想，指导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如何正确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方面，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辩证唯物主义是党的政策的理论基础

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违背了政策也就偏离了路线。对于这个道理，我通过认真看书学习，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才逐步地明确起来。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各项政策，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考察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制定出来的。要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就必须懂得制定党的政策的理论基础。否则，就不能理解党的政策的精神实质，就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是修正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我国现阶段的农村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生产资料主要是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力的水平还不高；广大群众的思想水平虽有很大提高，但毕竟还没有提高到共产主义的觉悟程度。我们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无一不是和这些情况相适应的。就拿多种经营的具体政策来说，从体制到收购政策、价格政策、奖售政策，都是从这些特点出发而制定的。在体制上，要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适合公社经营的，由公社经营；适合大队或生产队经营的，不能上调到公社经营。在收购上要及时，不能产品少了“鞭子赶”，产品多了“刀子砍”。在价格上，要规定得合理，各项产品之间的比价要保持平衡，不能随便压价、提价。在奖售上，要保持相对稳定，坚持兑现，不能随便取消或减少。所有这些，彼此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又是互相制约的。它对于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恰恰就在这个问题上，我过去却认识不清，总认为过于强调收购价格和奖售，是不是助长资本主义倾向啊？会不会发展资本主义啊？由于思想上有顾虑，讲起来就不理直气壮，做起来也不那么大胆。后来，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中，这个“思想疙瘩”才逐步地解开了。因为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发展的多种经营，是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指

导下，在国家计划的统一安排下进行的。而且发展多种经营的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的，所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是向国家交售的，所得到的收益，是归集体支配的。同时，随着多种经营的发展，集体经济收入不断增加，一方面可以用它购买化肥和农业机械，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社员生活，进一步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只有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才能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而社员家庭副业，是从属于集体经济的，能增加社会产品，增加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会不会发展资本主义，不在于搞不搞多种经营，决定的是个路线和指导思想问题，只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多种经营越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越巩固。

思想认识提高了，执行党的政策也就比较自觉了。近两年来，我们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了多种经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全区的皮棉单产连续两年超过百斤。一九七一年同一九六九年比，黄烟单产增长百分之二十，生猪存养量增加一倍以上，林业、油料以及各种副业生产也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政策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同的历史阶段实行不同的政策。我们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既然都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那末，在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中，只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从“左”的或右的方面进行干扰，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如果我们不从理论上弄清是非，划清界限，就要上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当。

在实践中掌握好党的政策

列宁指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是反映了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两条不同的认识路线。要执行正确的政策，必须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经常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从实践中获得真知。

一九七一年，我到临朐、益都、寿光等县去了解情况，发现各地在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方面有许多好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即农村经济政策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第二年春天，我带着一个调查组到安邱县岐山公社作调查，感到总的形势是好的，但突出的问题是没有真正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社员收益分配上有平均主义，不能按劳付酬；男女不能同工同酬。还有少数队农业生产连年增长，而社员收入却没有增加。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社员的积极性。所以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干扰、破坏，特别是他们煽起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不能很好落实；二是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政策界限模糊，分不清多劳多得和“工分挂帅”的界限，男女同工同酬和平均主义的界限，合理的奖励制度和物质刺激的界限；三是少数干部有私心杂念，怕得罪人，怕犯错误，不敢坚持党的原则。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同公社党委一起总结了一些执行政策比较好的单位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增强政策观念；

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划清政策界限，排除“左”、右干扰；深入发动群众，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来监督执行。我把这些情况向地委作了汇报，经研究后确定在这里召开全区的现场会议，介绍推广点上的经验，这对面上落实政策推动很大。事实使我认识到，正确的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离开了实践，就不能认识事物。如果光从理论上懂得了党的政策，不去和实践结合，只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那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要比较完全地认识一个事物，必须有一个过程。我到岐山作过一段调查，觉得在分配政策上，主要的问题是劳动计酬不合理。因此，我们就帮助各队改进劳动管理，搞好评工记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这样，满以为分配问题解决了。但群众还是不满意。他们说：“你拿个水瓢当葫芦，这才抓了一半啊！”根据群众的意见，我们又进行了反复调查，才察觉到：搞好劳动管理固然很重要，但它只能解决一个按劳取酬问题。而对于在正常年景下，如何使社员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的问题却没有解决。于是，我们又帮助各队认真贯彻执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压缩非生产性开支，严格控制农业劳动力，适当扣留公共积累。通过这些措施，正确地处理了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关系，更好地落实了分配政策，进一步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对生产促进很大。这件事使我深深体会到，要真正认识一个事物，只有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才能从不深刻的、不正确的、不完全的认识到比较深刻、比较正确、比较完全的认识。这是因为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是通过一定的过程和大量的现象表现出来的。参加一次实践、两次实践，没有了解它的全过程是不行的；接触一点现象、两点现象，没有掌握它的全部材料，也是不行的。

感性的东西要上升为理性的东西，“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一步做不好，也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我们在岐山公社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经过研究，认为原来的口粮、柴草分配等办法是合理的，确定保留，继续施行；原来的评工记分等方法不够完善，作了改进；过去的财务计划、开支审批等制度符合党的政策，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被取消了，现在要重新恢复起来。这样，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便使党的经济政策一项一项地得到了具体落实，受到干部、群众的好评。实践证明，要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掌握好党的政策，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才能分清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是主要的，那些是次要的，才能不被一些现象所迷惑，不受一些错误的东西所干扰。

用“两分法”指导落实政策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我们办任何事情都必须严格遵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法则。要把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真正落实，也必须坚持用唯物辩证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否则，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过去，由于没有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头脑中缺少辩证法，对党的基本路线理解不深，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识别不清，在解决一种主要倾向时，不考虑还会有另一种倾向出现，因而常常是“顾头不顾脚”，给革命和生产造成损失。为了吸取教训，改变这种状况，我结合

实际，认真读书，回顾了過去执行勞力政策方面的问题，感到很有教益。

例如：一九五八年，为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不顾政策乱调勞力，犯了错误。后来批判了这种错误，又偏到另一方面，该干的也不敢干了，使许多水库修起来没有配套，不能及时发挥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眼看这样继续下去是不行了，不得不反右倾，鼓干劲，重整旗鼓。经过以上的反复，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在执行政策上才逐步好了一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较快。特别是近几年来，广大干部、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掀起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

可是，在这种大好形势的掩盖下，部分单位又出现了平调勞力的现象。由于过去有过教训，我们发现后，毫不犹豫地给他们指了出来。但有些人却接受不了，阶级敌人也乘机在背后煽风点火地说：“看看吧，他们又在‘穿新鞋，走老路’啦！”有的同志由于界限不清，也把按党的政策办事，错误地认为是“走老路”，因而不敢坚持党的原则。但是，我们心里却有数，并没有因这种干扰而动摇落实政策的决心。这时，我们既采取以工换工、合理调整负担等办法解决了平调勞力的主要倾向，又防止了不敢再搞工程的另一种倾向，使农田基本建设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正确轨道稳步前进。

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是落实政策中必须注意的又一个重要问题。从我们地区的情况看，当前在执行农村各项经济政策中主要是“左”的倾向，如勞力的平调现象，分配的平均主义，非生产性的开支过大，以及对发展多种经营的各种限制等等。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便深入下去，总结了一些正确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典型经验，在面上加以推广，对克服以上倾向收效很大。但是，经过检查，发现这些经验在个别单位不

仅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助长了另一种倾向。如劳动管理上的烦琐哲学,养猪奖励过高等。这些问题的产生,还是由于我们头脑里的形而上学所造成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只是拿着一个公式千篇一律地到处硬套,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在工作中碰钉子是必然的。于是,我们又帮助这些单位克服了那些倾向。这样,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使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做到了“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过程,也是个人改造世界观的过程。几年来,有些单位在执行政策上所出现的问题,我也看到了,为什么没有及时帮助他们认真解决呢?主要是自己有思想顾虑,感到这几年形势发展很快,生产连年上升,去抓这些问题,是不是否定大好形势啊?弄不好要犯错误。通过学习,我才认识到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形势好,是客观存在的,是否认不了的。在大好形势下出现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你不正视它,它会影响大好形势;你解决了它,就会发展大好形势。所以,解决这些问题,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广大群众的要求,怎么会犯错误呢?认识提高了,抓政策落实也就比较扎实了。但是,情况在不断地发展着、变化着,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为了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我决心更好地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增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

(原载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落实林业政策 加快山区建设

中共安徽省泾县县委在路线教育中,认真总结经验,落实党的林业政策,加快了山区建设的步伐。

地处皖南山区的泾县,山高林密,资源丰富,是发展林业和多种经营的好地方。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中,中共泾县县委联系山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认真看书学习,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左”的和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党的政策落实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县委主要领导成员带领大批干部深入山区、半山区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落实党的政策的经验。位于青弋江两岸的太元公社,九万亩土地面积中,有八万亩是山场。这个公社总结推广太美大队梓龙坑生产队和元林牧场新屋生产队的经验,把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认真落实政策结合起来,在革命大批判中注意划清政策界限,从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出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山林管理措施。由生产队发动群众制订护林公约,组织护林专业队常年管理山林,同时把封山育林、改造次生林和解决社员烧柴等问题结合起来。改造次生林砍下的小材小料,除安排集体加工副产品外,也适当满足社员开展正当家庭副业的需要。这样做,既坚持了山林管理的社会主义方向,又切实解决社员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调动了广大社员群众管好山林的积极性,使山区各项生产建设得到很大发展。一九七一年,全公社封山育林八万亩,造林九百七十多亩,改造

次生林一千五百多亩，超额百分之五十完成国家木材收购任务，向国家交售的毛竹、茶叶比上年度增长百分之七十以上，粮食平均亩产跨过了《纲要》，农、林、牧、副各业总收入比上年度增长百分之二十，社员个人经济收入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一。县委总结太元公社的这个典型经验，多次举办学习班，并且召开林业现场会议，在全县加以推广，推动了山区各项政策的落实，加快了山区建设的步伐。

在全县二百一十万亩山林面积当中，有四分之一是宜林荒山，为了尽快绿化荒山，中共泾县县委在路线教育中，帮助各社队正确处理大集体与小集体、当前生产与长远建设的关系，领导他们积极兴办大队林场。这个县的黄田公社共和大队在兴办林场的过程中，合理解决山场所有权、劳力调配、林场收入分配等具体政策问题。林场由大队统一领导，生产队联合经营；生产队无力经营的荒山，由林场统一规划造林；农闲季节发动群众突击垦荒造林，平时由生产队按比例投工，固定专业人员管理。为了减轻生产队的负担，林场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自采种、自育苗、自造林，同时采取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办法，实行林粮间作，林油间作。一九七一年春天以来，这个大队林场共培育树苗十七亩，营造用材林和经济林九百多亩，并收获粮食一千四百多斤，芝麻、花生等油料一千多斤。由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大集体与小集体、长远建设与当年受益的关系，这个林场越办越好。县委总结推广了共和大队办林场的经验以后，全县兴办的大队林场很快由原来的五个发展到一百四十个，共已绿化荒山六万三千多亩，育苗一千八百二十六亩。

一九七一年秋天，县委在检查落实政策情况时，还发现不少社队路旁、水边和社员房前屋后没有栽树。原因是批判资本

主义倾向时，没有严格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把社员在房前屋后栽树也误认为资本主义倾向，挫伤了社员“四旁”植树的积极性。县委对照党的有关政策，检查了缺点错误，重申党的有关政策，号召全县人民积极开展“四旁”植树造林。一九七二年春天，这个县“四旁”植树比一九七一年同期增加了六倍多，而且栽树质量好，成活率高。

（据新华社，原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

要善于区别政策的界限

中共江苏省溧阳县委书记 刘岳五

路线决定政策，政策体现路线。落实党的有关农村经济政策的实践，使我认识到，只有善于区别政策的界限，才能有效地排除“左”的或右的干扰，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

区别两条路线 理解政策精神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毛主席的这一伟大理论，是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指导思想。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既体现了党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大方向，又考虑到当前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我们在贯彻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明确认识：既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要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又要有发展的观点，同形形色色的“左”的或右的思想严格地区别

开来。

要区别政策的界限，首先要区别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的界限。

一九七一年春天，我发现有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由于受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极“左”思潮和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错误地认为“对于家庭副业这个‘资本主义尾巴’，就是要卡紧，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倾向”。还有的说：“发展集体副业是大方向，家庭副业管死一点，关系不大。”这正是由于他们对党的关于农村副业的政策，没有从思想路线上和政治路线上来理解的缘故。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加强党对家庭副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方向，就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自发地发展家庭副业，则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的反映。因此，对发展家庭副业要区别：是在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条件下，利用业余和农闲时间搞，还是不参加集体劳动，只搞家庭“副业”；是有领导地就地取材、自产自销，还是自发地包揽加工、转卖牟利，等等。只有区别这些政策的界限，才能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只有区别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才能理解正确执行政策对于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重要意义。

裴圩公社大众大队，以前忽视对家庭副业的领导，结果使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露了头；后来对家庭副业又不加分析，一律“卡紧”，结果又影响家庭副业的发展。一九六九年，大队党支部坚持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统帅多种经营，注意区别政策界限，排除了“左”的或右的干扰。三年来，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壮大，家庭副业也得到适当的发展。一九七一年这个大队粮食亩

产超《纲要》，棉花亩产过百斤，家庭副业收入相当于增产三十多万斤粮食。这说明农民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在于是否加强党的领导，而不在于搞不搞家庭副业；搞家庭副业是否滋长资本主义倾向，关键在于是否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只有区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同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右的和极“左”思潮的界限，才能正确执行党的关于家庭副业的政策。

区别两类矛盾 体现政策精神

执行政策的过程，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毛主席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正确区别和处理这两类矛盾，是制定各项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保护群众，打击敌人，还是与此相反，这历来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体现政策的阶级性，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一九七一年在加强集市贸易的管理中，有的基层干部认为，对于违法交易的人，可以不加具体分析，一律当作投机倒把分子来处理；有的则对少数坏人兴风作浪也不闻不问。这两种倾向反映他们都没有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应该看到，有些人由于受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毒害，进行非法交易，这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用批评教育为主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按照对待投机倒把分子的办法去处罚，否则就是“左”了。另一方面又应该看到，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农村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阶级敌人往往以参加集市贸易为名搞投机倒把活动。因此，我们必须看

到阶级敌人这种进攻，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还要加强对集市贸易的管理，否则就是右了。

八集公社以前对集市贸易没有管。后来，为了防止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他们对于违反政策上市的物资，采取简单的处罚的办法，结果常常发生纠纷。后来，公社党委深入进行有关政策的宣传教育，加强对市场的管理，把政策交给群众，强调要进行调查研究和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的投机倒把分子，发动群众给以坚决打击；对于社员群众做了一些违反政策的事情，则以批评教育为主。这样做了，市场秩序得到了很大改善。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党的各项政策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制定的，只有在执行每项具体政策时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保护群众，打击敌人。

区别不同情况 具体落实政策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政策界限，是根据党的路线，从分析实际情况中划分的。因此，在落实政策时，必须注意区别不同的具体情况。

刘集公社庄黄大队，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时，运用典型开展路线教育，提高社员的路线觉悟；并且在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基础上，结合不同的情况，民主讨论，区别对待。例如，对于前几年已经变动的自留地，先教育群众清除“三自一包”的流毒，划清了两条道路界限；然后具体分析变动的原因，按照政策精神，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妥善处理。对于大田边有些社员的零星植树，也根据不同情况，按照有利于绿化造林、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加强群众的团结的原

则，分别确定继续归社员所有或折价归集体所有。由于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既坚持了政策的原则性，又体现了从实际情况出发的灵活性。政策落实了，群众很满意。

这个大队的经验说明：落实政策是一项十分复杂和细致的工作。要能坚持做到区别政策界限，就必须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路线觉悟，加强政策观念。有的同志对政策问题，仅凭现成的“杠杠”简单地“一刀切”，而且还错误地说什么“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等等。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有区别才有政策，“一刀切”就根本否定了政策。认真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办事就是方向，不能离开路线和政策抽象地讲方向。政策过了头，不偏右就偏“左”，方向怎能对头？执行政策右或“左”，都是偏离了党的路线，必然要削弱无产阶级专政。

执行政策的实践使我认识到，基层干部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县委领导在路线上的摇摆。过去由于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够，路线觉悟不高，不善于区别政策的界限，往往只是就事论事，看到“左”了就急于朝右拉，看到右了就急着朝左拉，有时没有拉到“线”上，有时又拉过了“线”。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克服执行政策中的偏差，首先必须提高县委领导的路线觉悟和政策水平。我决心认真看书学习，进一步地把加强政策观念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在区别政策界限上多下功夫，把自己锻炼成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带头人。

（原载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用党的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青海省刚察县落实党在牧区经济政策的调查

刚察县位于青海湖北岸，海拔三千多米，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县。从一九七〇年以来，这个县的党组织和革委会，认真贯彻执行党在牧区的各项经济政策，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实行以牧为主，农牧结合，以农促牧发展生产的方针，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相应地建立和健全了生产责任制和财务管理制度。由于党的政策调动了广大牧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个县的畜牧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一九七一年全县各类牲畜总增率达百分之二十八，净增百分之十四，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向国家出售肉畜、耕畜和各类畜产品的计划。一九七二年年初，刚察县虽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但仍夺得了仔畜成活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八，成畜减损率不超过百分之二的好收成。

关键在于领导

刚察县各级领导落实党在牧区的各项经济政策，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一九七〇年以前的一段时间，县革委会有些领导成员，由于受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的影响，对党的经济政策学习、研究不够，分不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

义路线和政策，划不清“按劳分配”和“工分挂帅”的界限，和建立必要的生产责任制和对群众实行“管、卡、压”的界限，因而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的经济政策的做法，使畜牧业生产受到影响。后来，有些领导成员虽然有所认识，但又顾虑重重，不敢坚持原则，采取“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错误态度。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新县委成立后，刚察县委和县革委会联系在执行党的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反复学习人民公社现阶段有关经济政策，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左”的和右的方面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罪行，认识到党的政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它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生产关系和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划清了一些是非界限，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

通过学习和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了路线觉悟。县委领导成员的精神面貌变了，大家团结一心，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对过去执行政策中出现的缺点错误，他们主动承担责任。干部中提出符合党的政策的意见和做法，就积极支持；发现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思想行动，就耐心教育帮助。在县委的帮助下，基层干部的政策观念大大提高，全县各级干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基础上，做到了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毛主席教导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刚察县委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解情况是掌握政策的前提，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

改造世界。因此，县委领导成员在落实牧区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不断洗刷唯心精神，做到情况明，方法对，决心大。从一九七〇年以来，县委八名脱产的常委中，经常有六人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县委四名正副书记，除留一人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都下到基层蹲点，调查研究，不断发现和解决落实牧区经济政策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总结和推广落实政策的先进经验。县委书记李树德，是一九七〇年底调来的。一年多来，他先后四次深入基层，到全县海拔最高的木里草原进行调查研究，认真落实党的经济政策。由于县委领导成员带头，各公社领导成员和县、社机关干部，也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七一年，县、社机关干部组成一百多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后五次共八个月时间深入基层，宣传党的政策，检查落实情况。

实践证明，落实党的政策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一九七〇年四月，县革委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在牧区加强劳动管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否切合实际，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新的问题？一九七〇年冬天，县委领导和泉吉公社党委书记又深入到这个公社的东风大队第二生产队进行调查，证实县里原来提出的意见基本可行，对生产起了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发现了新的问题，即牲畜死亡较多的队，社员收入增加得多；牲畜死亡少的队，社员收入反而较少。他们进一步研究分析，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原因，是原来规定死亡牲畜残值和向国家出售活畜的收入参加分配的比例不恰当。于是，经县委集体讨论研究，及时修改了原定的比例。一九七一年夏天，县委又派人继续深入东风大队第二生产队和其他公社的一些生产队作调

查,发现这个办法比原规定的效果好,但基层干部和牧民群众又提出了改进意见。最后县委广泛集中了群众意见,确定了一个更加符合政策的比例。这样执行的结果,纠正了过去不合理的现象,促进了集体生产的发展,干部和群众都比较满意。

不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

刚察县的实践证明,落实党在牧区的各项经济政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九七〇年,县革委会在牧区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决定对劳动积极,管理负责,成绩显著或者超额完成任务的小组和个人给以适当的奖励。当时全县大多数社队都表示拥护,认真地贯彻执行这项制度。但有一个公社的个别领导人,由于受刘少奇一类骗子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的影响,认为这样做是“物质刺激”“金钱挂帅”,因而不积极执行这项制度。结果,这个公社的草山等自然条件虽然比别的公社好,但一九七一年的畜牧业生产却落在全县其他四个公社的后面。县委便用正反两个方面的事例,多次对这个干部进行路线和政策教育,帮助他提高路线觉悟,增强政策观念。一九七一年年终分配时,他深入各大队,带头落实党的政策,坚决纠正过去违反政策的错误作法,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牧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九七二年以来,这个公社牲畜的损失死亡现象显著减少,幼畜成活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六以上,成畜减损只占百分之一左右。

在落实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刚察县委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注意可能被掩盖的另一种倾向。一九七〇年春天,县革委会个别领导成员对执行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方针理解片面,采取了从畜牧业抽调劳力来加强农业生产的错误

作法，以致削弱了畜牧业生产，农业也没有搞上去。县委和县革委会纠正了这种错误作法，但少数社队又出现另一种偏向，认为牧区搞农业可有可无，放松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结果农业搞不上去，畜牧业生产也不能很快发展。为了正确贯彻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方针，县委及时总结和推广了东方红大队的经验。这个大队地处海拔三千三百米的高寒地区，由于领导班子全面地理解农牧业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在重视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同时，又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在农业点上的社员以大寨贫下中农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改进耕作技术，实行科学种田，连续五年获得农业的好收成，为牧业提供饲料四十八万斤，饲草九十四万斤。同时在农闲时抽出劳力，支援畜牧业进行基本建设，共修建畜圈四十个，打井两口，并进行了草原灭鼠等工作，促使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大队各类牲畜的存栏数比一九五九年增加四点一倍。这个大队的经验推广以后，促进了全县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刚察县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相信和依靠群众，作为落实党的政策的根本路线。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一）紧密结合党在牧区的各项中心工作，对群众进行政策教育。一九七一年，全县集中地进行了三次路线教育，每次都把宣传和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列为一项重要内容，把路线教育和政策教育结合起来。（二）全县从一九七〇年以来，召开了三次有生产队以上干部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认真学

习党的方针政策；县委领导成员每次深入基层，都把了解政策落实情况，宣讲党的政策，作为主要工作内容，走到哪里就宣传到那里。（三）各社队把分配的过程，作为政策教育的过程，组织社员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四）专门举办落实政策的学习班，组织干部、牧民反复学习党的政策。通过这些措施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出现了干部群众一起学习政策，宣传政策，执行政策的良好风气。

（原载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贵 在 坚 持

——铁场大队落实党的经济政策的经验

广东省龙川县铁场公社铁场大队党支部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遵照毛主席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坚持同“左”的和右的干扰作斗争，不折不扣地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调动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展了革命、生产的大好形势，粮食亩产超过千斤。

出现“左”右干扰时，要敢于 坚持斗争，坚持党的政策

有段时间，铁场大队有些生产队在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过程中，经常出现忽“左”忽右的现象。党支部意识到，这主要是由于干部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看问题。要全面落实党的政策，就必须教育干部提高路线觉悟，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既看到事物的正面，又看到事物的反面；在注意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同时注意它所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敢于同“左”右干扰作斗争。

红社生产队，过去在刘少奇的“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没有注意从思想上去教育社员群众为革命积肥，而单纯地用工分去“调动”社员群众的积肥积极性，结果有的社员为了多得工分，交肥只图数量，不讲质

量。后来批判了“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即任意降低投肥工分，甚至主张取消报酬。针对这种情况，党支部带领这个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学习党的经济政策，经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只顾工分，不讲贡献，是错误的；不坚持按劳计酬的原则，取消交肥的合理报酬，也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以后，生产队一面对社员群众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一面发动社员群众讨论制订交肥计酬的新措施。这样一来，调动了群众为革命积肥的积极性，生产队的肥料迅速增加，一九七一年以来每造每亩基肥达六十担以上，为夺取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

铁场大队党支部很注意全面落实党的政策。在劳动计酬上，他们既反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又注意克服“一拉平”的平均主义，坚持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给合理的劳动报酬；在粮食分配上，既反对“分光吃光”，又注意防止“多留少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在副业生产问题上，既反对“副业单干”，又注意防止限制社员发展正当家庭副业的倾向，坚持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积极支持社员发展家庭副业。

群众情绪高涨时，要用政策

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近年来，铁场大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在一片赞扬声中，有的人头脑有些发热。一九七一年冬天，大队党支部决定兴建三项比较大的水利工程，争取闯过水利关。群众对这个决定非常支持。在这

种情况下，有的人就片面强调共产主义大协作，主张修水利一律不给报酬。党支部认为，群众决心大、风格高是好的，但是，作为领导者必须注意执行党的政策，用党的政策去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心血来潮，忘乎所以。那种不分是否受益，一律无偿地调用生产队人力、物力的做法是违反党的政策的，这样做，势必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为了纠正这种片面看法，党支部就同干部、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有关政策方面的论述，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左”的方面干扰和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行。大队全体干部又分头深入工地，和群众一起讨论制定落实政策的具体方案，一面积极组织大协作，一面通过换工等形式对参加协作又不能受益的生产队给予合理报酬。由于坚决执行了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经过三个多月的奋战，三项水利工程胜利完工，做到当年动工当年受益，旱涝保收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四十。

任务重工作忙时，要靠政策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有的生产队在时间紧，任务重，工作比较被动的时候，容易放弃党的政策原则，而迁就错误意见。一九七一年春耕抢插时，旭日生产队由于没有很好地落实党的经济政策，挫伤了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插秧进度缓慢，受了批评。当时有些人就性急起来，主张用工分去“刺激”群众积极性。党支部认为这样做不但不能扭转被动局面，而且会把群众引向邪路。党支部针对这种错误倾向，同干部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学习党的政策，开展革命大批判。大家认识到，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代表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坚

持党的政策原则，坚信党的政策威力，用党的政策去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干部增强了政策观念，认真落实政策，切实加强劳动管理。政策落实好，群众干劲高，劳动效率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提前半个季节完成了春耕抢插任务。

（原载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执行政策的带头人

江苏省建湖县建阳公社顾东大队党支部领导成员，带头执行党在农村中的各项经济政策，得到群众的好评。这里记述的是他们带头执行政策的两个故事。

这笔账应该算

一九七一年，有一天，大队党支部委员、第七生产队队长丁为学和一个社员高高兴兴地挑着两担黄橙橙的稻谷，向第五生产队走去。五队的干部和社员见了都很惊奇，不知是怎么回事。

原来，夏收夏插的时候，七队缺一部分秧苗。相邻的五队干部和社员知道后，便连夜起了多余的一亩多小秧支援七队。时隔不久，七队听说五队一九七二年由于开垦了一部分荒地，劳力有点紧张，夏插进度不快，就主动派出一部分人，帮助五队栽了十几亩稻秧。两个队互相协作，都提前完成了夏插任务。

事后，在一次清工结账会上，七队的代表主动提出了要结算夏插中互相协作的那笔账。五队同志说：“我们给了你们一亩田的秧，你们帮助我们栽了十几亩的秧，互相抵抵算了。”

七队的社员觉得不能这样做。他们说：“你们培育一亩田小秧的工，就抵上栽十几亩稻秧的工了；二百多斤稻种还该补

给你们。”

五队社员听了，忙说：“我们都是为革命种田，这笔账何必这样分清理白的。”

七队多数社员坚持要把这笔账算清楚，但也有少数社员认为：既然人家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我们就不算吧！大队党支部委员、生产队长丁为学心里想：这不仅是一个算不算账的问题，这里面关系到是不是贯彻“等价交换”政策的问题。为了帮助大家增强政策观念，老丁和大家一起学习了党的有关“等价交换”方面的政策，使大家划清了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与“一平二调”的界限，一致认识到，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应该发扬，“等价交换”的原则也必须坚持，如果只讲风格，不讲政策，不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共产主义协作精神也就不能继续发扬，群众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于是，老丁就和一个社员一起，挑了两担稻谷主动地送到了五队。

先 公 后 私

怎样摆正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顾东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顾仁俊在正确处理柴草的问题上作出了好样子。

一九七一年深秋的一天，顾仁俊的舅舅从外地来到顾东大队搞柴草，见到水乡柴荡芦花放，社员挥镰割柴忙，场头上、沟塘旁，齐斩斩的柴捆堆得象小山一样，非常高兴，心想：这次来运柴是三个指头捏田螺——十拿九稳了。

中午，仁俊收工回来，刚坐下不久，舅舅就向他说明了来意。仁俊心想：国家柴草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集体柴草还没留足，怎能先给私人呢！就婉言向舅舅做了解释。舅舅听了仁俊的话，有点失望。仁俊的母亲说：“柴草还有我家一份呢？不

过在时间上提前些，拣点好些的！你是大队干部，这点主还不能做吗？”仁俊觉得母亲和舅舅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和位置摆得不正，把个人利益放在前面了。为了帮助母亲和舅舅提高认识，仁俊就和他们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教导，学习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狠批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少留多分”等修正主义黑货。接着又对母亲说：“你不是经常讲要一心为集体吗？队里的柴草刚收下，如果他要早点买，你要弄好的，那怎能先满足国家、集体这一头？我是大队干部，应该带头执行党的政策啊！”听了仁俊的话，母亲和舅舅觉得很有道理，懂得了在分配问题上，是先考虑到国家、集体，还是先想着个人，这不是小事，是关系到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大事，便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赞同了仁俊的意见。

过了不几天，在全大队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国家、集体柴草征储任务以后，各户社员都分到了一部分柴草，仁俊才把自家的那一份柴草让给了舅舅。

（原载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发挥生产队的积极性

四川省南部县安坝公社党委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注意发挥生产队的积极性，使各生产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安排生产计划，确定生产措施，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不断发展。这个公社粮食连续两年跨《纲要》，棉花亩产连续三年过百斤，油料、生猪等多种经营也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安坝公社从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以来，粮食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在大好形势下，公社和大队有的干部遇事不注意同生产队干部和群众商量了，布置生产活动往往要求行动一致，安排作物种植面积和推广外地良种，也不顾实际情况，强调整齐划一。这种不尊重生产队权限的做法，在一些生产队里造成了不良后果。公社党委最初认为这只是工作方法上的缺点，不大重视。后来，通过调查研究，从下面两件事得到很大启发：

一九七〇年，公社为了扩大复种面积，规划缩小冬水田三百亩，由种一季改为两季。县有关部门认为规划少了，给公社分配了六百亩的任务。公社没有和生产队干部、群众商量，就把任务分了下去。由于放水太晚，冬水放掉了，小春粮食作物却没种上，结果造成减产。另一件事是推广矮秆水稻良种。几年来，这个公社推广了矮秆水稻良种，绝大部分生产队都增

产了。但是，这种品种耐肥，一些条件差的生产队，不愿大量推广。公社党委忽视了这种差别性，提出要“全公社水稻矮秆化”，并布置各生产队限期到粮站换种。有的生产队为了应付公社检查，把高秆水稻“陆才号”挑进粮站，但挑回来的还是“陆才号”，既浪费了劳力，又补了差价。

公社党委书记谢仕培同志发现这个问题后，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想，为什么公社布置的工作，有些在下面行不通？他回到公社召开了党委会议，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的教导，学习了党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认真总结检查了公社党委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大家认识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是党在农村现阶段的重要政策。因此必须切实尊重生产队的权限，充分发挥生产队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过去布置下去的工作，有些生产队所以完成不了，就是因为没有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提出的任务不适合当时当地群众的要求。认识提高后，大家又分别到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改进领导思想和作风。一九七一年以来，公社、大队在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都先在点上取得经验，充分发动群众讨论，按照国家计划，因地制宜，合理安排种植面积，确定增产指标和措施；支持各队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多种经营，增加集体和社员收入。

这个公社党委还经常召开有各生产队干部、社员代表参加的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纠正不切实际的工作部署。如一九七一年中稻收割后，公社布置每个队必须利用稻田增种五至七亩晚秋作物。任务下达

后,有的队提出种不了那么多,有的队又要求多种。公社党委采纳了下面的意见,允许各生产队灵活掌握。这样,各队选择有条件的稻田及时排水翻耕,种上了秋红苕,大部分做到了有种有收,有的亩产达两千多斤。农田基本建设方面,也改变过去自上而下分配任务的办法,由生产队自己订时间,订任务,安排劳力。

安坝公社党委在注意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生产队的干部、群众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及时指导生产队的各项生产活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他们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际,经常抓住方向、路线上的问题,组织干部、社员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和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提高干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发挥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的优越性,并防止了违反国家计划的资本主义倾向。

(原载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他们又参加修塘了

一九七二年春天，辽宁省义县高台子公社台子山大队同八个生产队商量，要再挖一座大方塘。就在要“上马”的时候，七、八队突然提出不参加了。这下子，改变了大队原来的部署，大伙都挺着急。在党支部对这个问题重新进行研究的时候，多数同志认为，七、八队变了卦，一定有原因，大队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有的同志却说：“啥原因？还不是怕他们的地受不着益！不管通不通，这是大队的决定，得通知他们派人参加。”

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大队党支部先组织大家学习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等党在现阶段的有关农村经济政策，并且引导大家回顾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一九五八年，这个大队要搞一座方塘，在刘少奇一类骗子刮起的“平调风”的影响下，让一些不受益的生产队也参加了，又没有执行“等价交换”的原则，结果挫伤了这些队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干了一冬春，工程只搞了半截，后来被洪水冲毁了。一九七〇年秋天，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他们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破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策的罪行，反复同受益队协商，实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重新挖方塘，充分发挥了各队的积极性，只用一秋的时间就挖了一座长八十米、宽三十米、深七米的大方塘，能自流灌溉七百亩。大家联系这些，深入领会“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等政策，懂得了生产队是现阶段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它有根据党的政策和群众的意见组织安排本队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权力。于是大家一致主张：“七、八队参加不参加，要尊重他们的意见。”

大队党支部又对这两个队进行了调查。原来这两个队对搞水利要求挺迫切。大队在商量修方塘时，这两个队的干部和群众开始是同意的，可是，仔细一了解，这座方塘离他们的地较远，群众担心说：“等别的队都浇过了，再轮到咱们，可能庄稼就旱得冒烟了。”因此才决定不参加了。党支部认为七、八队的意见有道理。于是组织人力对方塘的水量重新进行了测量，又和受益队协商，一致同意给离水源远的七、八队修专用干渠，保证各队可以同时灌溉。这样七、八队的干部和群众都同意参加了。

当这两个生产队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了本生产队所承担的任务，交给群众讨论时，有人曾流露出要把强劳力留在队里，派弱劳力去挖方塘的打算。大队党支部又及时帮助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教导，把讨论会变成了路线教育会，提高了大家的觉悟。在修方塘时，七、八队都选派了一支强劳力队伍，和其他队团结战斗，成了全工地工程进度快质量好的先进队。

（原载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认真读书 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中共吉林省德惠县委书记 石冶金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比较系统地读了几本马列的书，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注意结合实际工作，加深体会。

一九七二年春季我到下边去，发现有些生产队在执行分配政策上有平均主义倾向。群众反映说：“死分死记，平均主义，劳动好的吃亏，劳动差的便宜。”基层干部看到不管劳动质量、数量，一律拉平的现象，也不满意。但是，怎么做才对呢？思想上不明确。

过去，我遇到这种情况，至多也只能就事论事地解决一下。这次，因为学得了一点革命理论，眼界就宽一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来认识，一定的分配制度，依赖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存在，必须承认每个人在劳动上的差别，否则就会违反客观规律，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正是党制定在社会主义时期分配政策的理论根据。如果不考虑劳动数量和质量的差别，你评十分，我也评十分，这样只能挫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当然，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

中，是不可避免的”。

我用这些道理，引导干部、群众去认识存在的问题，分清多劳多得和“工分挂帅”的界限，分清同工同酬和“平均主义”的界限，纠正了过去“老十分”的作法，并且从实际出发，采取了“按劳力分等，季节标准分，死分活评”等办法，认真落实党的分配政策。政策落实后，出工的人数增多了，劳动的质量提高了，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生产形势一派大好。

不久，我又发现有的地方在评工记分上注意了纠正平均主义，却出现了分等过多，差距太大的现象。这样不仅造成了评工记分上的烦琐，更主要的是造成强弱劳力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有的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目标认识不清，忘记了搞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承认分配上的差别，是为了缩小和消灭分配上的差别，现在搞按劳分配是为了过渡到按需分配。为了纠正分等过多，我和公社、大队的领导同志一起进行了调查研究，针对存在的问题，总结交流了先进典型经验，使党的分配政策在全县得到进一步的落实。

经过一段实践，我体会到：作为一个领导者，只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懂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党是怎样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制定这些政策的。懂得了这一点，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党的政策，抵制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原载一九七二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

坚持政治挂帅 搞好劳动计酬

临 安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时指出：“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种分配原则是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的。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

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在农村时而大搞“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时而大搞“平均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劳动计酬的标准上制造混乱。他们大搞“平均主义”就是妄图使多劳不能多得，同工不能同酬，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瓦解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彻底批判。

要正确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提高社员为革命种田的觉悟，坚决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是不能分割的。我们必须帮助社员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集体、为国家作出贡献，坚持党的政策，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如果不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单纯地用工分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那就势必要滑到“工分挂帅”、“物质刺

激”的邪路上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我们必须紧密联系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全面理解“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正确处理政治同经济的辩证关系，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原载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划清界限

一九七二年小秧落谷的第一天，江苏省洪泽县盱丰大队合心生产队的送肥小组在评工记分的时候，给一心为集体、干活劲头大的贫农社员刘大桂多记了三分工。事后，个别社员说：“老刘力气大，工分就冒头，这跟过去搞“工分挂帅”有啥不同？”听了这话，有的社员就嘀咕起来：干活还得随大流，免得人家说闲话。劳动作业组长自问：“这真是‘工分挂帅’吗？”他去请教生产队长老杨。老杨询问了当天送肥和评工的情况，说：“这不是‘工分挂帅’，你们做得对！”

这件事很快被大队党支部知道了，在党支部帮助下，老杨进一步认识到：政策是路线的体现，只有教育社员划清两种政策、两条路线的界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才能真正贯彻下去。于是，他组织全队社员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围绕“送肥小组这样做是不是‘工分挂帅’”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会上，老杨首先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四夏”大忙，他们的春秋栽得很慢，眼看就要误了季节。他想：要加速插秧进度，只有用加大工分的办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就把每亩的定额工分由两个工加到两个半。这样一来，虽然进度加快了，基本上按时栽完了春秋，可是有些田块却栽得两头密麻麻，中间稀拉拉，田也整得高的高洼的洼，结果减了产。谈到这里，老杨要求大家把送肥小组给大桂多记工分的情况，跟那次整田栽秧进行对比分析。

不比不知道，一比见分晓。大家说：那次整田栽秧靠的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搞工分挂帅，有人为了抢工分只图快不图好，结果危害了集体经济。这次送粪，组长事先就向大家讲明了运肥对于保证丰收、支援世界革命的重要意义。在运肥中，别人是抬，刘大桂是挑，为了防止粪水晃出来，他还在桶里放上了草把。有人劝他少挑些，他说：“我劲大就该为革命多出力。”他对集体的贡献比别人大，在坚持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给他适当多记工分，是本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办事，不是工分挂帅。最后，队长进一步指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觉悟水平制定的，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刘少奇一类骗子一会儿推行“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一会儿又大搞平均主义，从右的和“左”的方面干扰这一政策的落实，其罪恶用心就是要破坏党的基本路线，破坏和削弱集体经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向送肥小组学习，坚决贯彻这一政策，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经过分析对比，大家认识提高了。第二天，队里掀起了为革命争贡献的新热潮，不仅送肥组的粪担子由一副增加到六副，其他作业组的社员们也干得更起劲了。

（原载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记了工分会降低“风格”吗？

五月的一天夜里，辽宁省锦西县向阳公社茨梅花沟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部灯火通明，“记了工分会不会降低风格”的讨论会正在热烈地进行着。

原来，为了给一九七二年大田作物多追肥，前些天，民兵二排长邢五清把民兵组织起来，利用几个晌午和晚上的时间，突击脱坯三千六百多块，这样，换炕时换下了三万多斤作追肥用的炕土。事后有人建议，应该表扬这些民兵，还要按照劳动定额给他们记工分。但有人说：这件事应该表扬，不过在民兵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记了工分，就降低了他们的“风格”。因此，还是不记工分为好。

这些话引起了生产队长邢五合的深思。他想：政策是路线的体现。应该抓住这件事情，提高大家的路线觉悟。当天晚上，他组织大家学习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让大家对“民兵利用业余时间脱坯的工分该不该记”，“记了工分是不是就降低了风格”的问题进行讨论。

共产党员邢万瑞开了第一腔：“民兵们白天和社员一样在地里干活，晚上收工回来忙着闷大泥，大晌午忙着脱坯，把苦和累甩在一边，脱了那么多好坏，我看，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劳动工分也该记。记了工分就要降低风格的顾虑，是多余的……”。这时，几个老贫农也纷纷发言。有的说：邢万瑞

的话在理，表扬和给合理报酬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的说：只强调表扬而不给合理的劳动报酬，或只抓劳动计酬而忽视政治思想工作，都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也不符合政策精神。

这时，一直认真听着大家讨论的邢五合站起来补充说：“是啊，大家把问题看得很全面，唠得很深刻。咱们一定要划清界限，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大家七嘴八舌，越议心里越明白，增强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经过大家评议，给了民兵们合理的劳动报酬，又在群众中表扬了他们为革命种田，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号召大家向民兵学习。打这以后，大家更加关心集体生产，努力为集体多积肥。

（原载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从运肥效果看落实政策的作用

一九七二年春播，山东省安丘县牛沐公社李家院庄大队的七百亩春田，施土杂肥两万四千车。这些肥料，按照上年运送的速度，四十辆小车要运六十天；而现在四十辆小车只运了三十天，这些肥料就全部运到了田间，节省工日一千二百个。这两万四千车肥料是怎样运到田里的？为什么比一九七一年快得多？这里有一段曲折过程。

慢 在 哪 里？

两万四千车肥料，从社员家抬出、砸碎，及时运到田里，任务确实不轻。为了尽快地完成任务，大队党支部全体成员分别到各生产队进行动员，还指定专人写标语牌，插在田头路边，随时向社员进行宣传教育。他们想：这样一搞，生产任务压着，思想工作跟着，运肥速度一定慢不了。谁知道，事情和想象的恰恰相反。全大队呼呼嚕嚕折腾了几天，尽管有的生产队还出现了打夜班的现象，但工效还是很低，平均日进度每人只运十车。他们照这个速度一合计，四十个人专门运肥，到清明节也完不成。对此，党支部书记很纳闷：“思想工作抓得不松，汗水淌得不少，效果为啥不好？”

后来，党支部开会研究，决定听取群众意见。五个生产队，支委调查了四个。男社员反映说：“论天不论数，劲头难

鼓足。”女社员意见更大：“男女同工不同酬，搬走泰山也是七分半，谁还乐意多淌汗？”最后到达第三生产队，情况完全不一样。这个队八辆小车一天运肥二百四十车，相当于另外三个生产队一天运肥的总和。问他们的经验是啥，干部、社员都说：“执行政策好，运肥干劲高！我们实行定额记工。”

情况摸透了，干部的思想开了窍。大伙联系着前段运肥中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认真执行政策的重要性。大家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这几天运肥速度慢，问题在于没有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党支部集中了群众的正确意见，决定贯彻执行劳动定额的政策。

怎样做才对？

运肥实行定额记工后，工效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同时也发生了一些新问题：一队有的社员用驴拉车往南山送肥，只顾超额不顾牲口劳累，惹得饲养员大有意见；四队八辆小车向西洼送肥，争着往近的地头堆。这些情况引起了大队干部的注意，心想：前段运肥速度慢，是因为政策不落实；现在政策落实了，群众也满意了，为啥又发生了问题？到底应该怎样做才对？大队党支部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有关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的论述，认识到，党的政策的确是调动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可靠保证。然而，在执行具体政策时，不能忘记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不能忘记大方向；要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提高社员爱国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否则，两手抓定额，两眼盯进度，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会重犯“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错误，把社员群众引到邪路上去。

认识提高了，怎样做的问题也就清楚了。他们在运肥过

程中，遵照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伟大教导，坚持对社员群众进行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真正懂得为啥实行劳动定额和为谁完成劳动定额的革命道理。在评定劳动计时，既看社员完成定额的情况，又看社员的劳动态度如何，真正形成一个好人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有人抓的局面。这样，既调动了社员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又保证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沿着正确路线健康发展。例如，第二生产队挖圈抬粪，过去三个人一天抬挖一个圈，现在三个人一天抬挖三个圈。又如，第五生产队在“春天流身汗，秋天万担粮”，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的战斗口号鼓舞下，每人每天推肥近三十车。再如一队，过去十个半劳力一天只捣粪四十车，经过落实政策和思想教育，提高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觉悟，现在每天能捣粪百余车，并出现了很多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好思想、好风格。

就这样，只三十天的时间，全大队就把两万四千车肥料运完了。

（原载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兼顾

——马壁大队正确处理基本建设投资
和社员当年分配的矛盾

山西省平遥县段村公社马壁大队，正确处理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和社员当年分配的矛盾，从一九六九年以来，这个大队共搞了几十项水利工程，完成了机具配套，既没有向国家贷款，又做到了年年分配兑现。

这个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开始后，少数干部主张把工程全面铺开。大队党支部认为，基本建设是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应该大搞、多搞、积极地搞。但是，必须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地搞，不能摆花架子，也不可一时搞得太多，开支过大。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三年中，这个大队分期分批陆续修成了一条五里长的穿山引水洞，一条六里长的清水渠，一眼深二十米、直径三米半的截潜流大井。在水土流失的土山头上，修了五百亩高标准的大寨田。一座小型水库已完成了大部分工程。他们计划在三、五年内使全大队实现水利化。由于他们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坚持了“队办为主，小型为主，当年受益为主”的方针，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做到了年年有工程，年年能受益，年年社员分配能兑现。

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这个大队始终本着节约的精神，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设备自己搞，砖、水泥、石灰自己烧，工具自己修，炸药自己造，节约了大批开支，减轻了社员群众的

负担。例如，这个大队要从二十里以外的沙沟引水，需要一万根一米长的水泥管；如果买的话，按每根六元计算，一万根就得六万元，要花去全大队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还多，社员当年分配就会受到影响。后来，他们只花了一百多元买了一些旧铁皮和木料，造了八个做水泥管的模具，利用马壁河滩石头多的特点，自己备石料，制水泥，做成了水泥管。每根水泥管合计成本两元。仅这一项，就节约了四万元。

为了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足够的资金，这个大队在保证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力和资金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副业生产，一年可以收入三至五万元。

这个大队还积极帮助社员群众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这样做，即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支大些，社员家庭副业发展了，社员生活也不会受影响。三年来，他们供给社员小猪崽一千八百多头，羊羔六百多只，兔四百多只。每年每户饲养猪、羊、鸡、兔的收入平均在七十元以上。社员发展养猪、养羊等副业，每年还为农业生产提供十几万担好肥料。

三年来，这个大队由于有计划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正确地处理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和群众当年分配的矛盾，工程搞得多快好省，粮棉产量逐年上升，社员收入逐年增加。

（原载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统一书号：3144·41

定 价：0.28 元